

## 世變與權衡：張元濟的政治立場析論

劉怡伶\*

### 摘 要

此一專題研究的重點在考探張元濟於維新運動、立憲運動、辛亥革命、國共之爭等歷史轉折處，所持的政治立場各自為何？其間有無矛盾？進而釐清其歷史定位。本文從歷史文獻出發，針對張元濟所持的觀點，並對照其實際作為，以分析張元濟在幾個重要時期對政治的思考與基本態度。

本文探索得知：張元濟自從被革職，遠離官場而致力文教後，儘量避免涉入現實政治，但不減對國內政局的關心。從維新失敗至辛亥革命成功，張元濟的政治基調由溫和漸進的改良派轉為革命派，革命成功後，其立場又轉為溫和，至其晚年，目睹政局動盪造成的民不聊生、貪污舞弊現象，張元濟痛心而屢屢呼籲維持和平。張元濟的政治立場迭有變化，但其所關切的主軸始終在於民眾的福祉，從傳統「民本」到現代「民主」，兩者交集的「民」是其恆然的優位考量，這同時體證了其愛國、人道、民族主義的一面。

**關鍵詞：**張元濟、維新、革命、共產黨、國民黨

---

\* 聖母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專任助理教授。

## 壹、前言

清光緒壬辰進士、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張元濟（1867-1959），字筱齋，號菊生，原籍浙江海鹽，廣東出生，生值近代中國變動最為劇烈的時期。他曾任刑部貴州司主事、總理衙門章京，戊戌年間創辦了通藝學堂，後因同情變法而被革職永不錄用。仕途受挫之後，他進入南洋公學與商務印書館工作，推動文教及出版事業，是中國近代新式出版業的奠基者。

學界對張元濟的相關研究，在親友回憶以及紀念性文字外，涉論較多是關於張元濟在古籍校理與文教出版事業的作為，如：葉宋曼瑛《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sup>1</sup>、王紹曾《近代出版家張元濟》<sup>2</sup>、汪家熔《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sup>3</sup>、吳方《仁智的山水——張元濟傳》<sup>4</sup>、陳建民《智民之夢——張元濟傳》<sup>5</sup>、柳和城《張元濟傳》<sup>6</sup>、張榮華《張元濟評傳》<sup>7</sup>、張人鳳《智民之師——張元濟》<sup>8</sup>、李西寧《人淡如菊——張元濟》<sup>9</sup>、周武《張元濟——書卷人生》等<sup>10</sup>。這些專著以傳記式研究為主，不乏細密的探討，在不同程度上觸及了張元濟在維新、立憲、辛亥革命以及四、五〇年代動盪及兩岸分治階段的角色，唯對張元濟政治立場方面的探析，仍有未臻詳瞻或失察之處。以葉宋曼瑛著作為例，作者掌握許多的一手資料，詳細論述了張元濟生平及事業，是八〇年代具啓發的研究，該著雖不專就政治方面而寫，但葉宋曼瑛也說：

王雲五提出了數萬言詳細材料，說明他為甚麼和怎樣選擇了追隨蔣介石政府的道路，而張元濟卻沒有直接聲明或公開闡述他留在中國的決定。<sup>11</sup>

<sup>1</sup> 葉宋曼瑛著，張人鳳、鄒振環譯，《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年）。

<sup>2</sup> 王紹曾，《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年）。

<sup>3</sup> 汪家熔，《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

<sup>4</sup> 吳方，《仁智的山水——張元濟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年）。另有繁體版，由臺北業強出版社於1995年出版。

<sup>5</sup> 陳建民，《智民之夢——張元濟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

<sup>6</sup> 柳和城，《張元濟傳》（南京：南京大學，1996年）。

<sup>7</sup> 張榮華，《張元濟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

<sup>8</sup> 張人鳳，《智民之師——張元濟》（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

<sup>9</sup> 李西寧，《人淡如菊——張元濟》（香港：中華書局，1999年）。

<sup>10</sup> 周武，《張元濟——書卷人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

<sup>11</sup> 葉宋曼瑛著，張人鳳、鄒振環譯：《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頁7-8。

葉著成書於 1983 年，是其英文版的博士論文，距今已逾二十多載，當時受限文獻，未及徵引新出史料，故針對張元濟留在中國的底蘊，未全面的討論；又，王紹曾等人對張元濟致蔣介石的歸順書也感興趣，但張信存在之錯認史實問題卻也未加釐清、甚至受特定的意識侷限，如王紹曾云：

這裡值得大書特書的是：一九五七年六月十五日張先生以浙中父老的身分給負隅臺、澎、金、馬的蔣介石寫信，勸告他效法五代末「踞有全浙八都，軍威著於一時」的吳越統治者錢鏐（武肅）（筆者按：應為錢鏐之孫錢俶，詳本文後述），「默察時勢」歸順宋王朝那樣地投效祖國，完成祖國的統一大業。這是一篇擲地作金石聲的巨文，足以傳頌千古。<sup>12</sup>

職是之故，晚年的張元濟究竟如何看待國、共之爭，這方面的考析仍可填補罅。至於其他零星篇什，則多半側重張元濟某一時期之表現，例如張人鳳〈戊戌到辛亥期間的張元濟〉<sup>13</sup>、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召見張元濟〉<sup>14</sup>、承載與王恩重〈張元濟和清末立憲運動〉<sup>15</sup>，其中又以張於戊戌時期之作爲討論居多，然而張元濟一生經歷晚清、民國、臺海兩岸分治的世變，在幾度政權交替之際，如何自處及回應，就現有的研究成果，中國大陸及海外學界，或因限於當時的史料不足、政治氛圍，致若干內容及說法有商榷之虞。

臺灣學界對張元濟的瞭解，由於兩岸隔膜的政治因素，故早期對他的生平與事蹟顯得陌生，1990 年後始出版張元濟與友人往來的書信集與張元濟簡譜，而以張元濟爲題的學位論文、專書及單篇文章則在 1999 年後陸續出現，如吳栢青《張元濟及其輯印四部叢刊之研究》<sup>16</sup>、劉怡伶《張元濟思想研究》<sup>17</sup>、蔡崇安《張元濟經營商務印書館之研究》<sup>18</sup>、孫慧敏〈翰林從商——張元濟的資源與實踐（1892-1926）〉等<sup>19</sup>，吳著屬張氏古籍整理研究、劉著論及張元濟生平志業的

<sup>12</sup> 王紹曾，《近代出版家張元濟》，頁 18。

<sup>13</sup> 張人鳳，〈戊戌到辛亥期間的張元濟〉，《史林》，第 2 期（2001 年）。

<sup>14</sup> 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召見張元濟〉，《社會科學研究》，第 5 期（2008 年）。

<sup>15</sup> 承載與王恩重：〈張元濟和清末立憲運動〉，《浙江大學學報》，第 12 卷第 4 期（1996 年 12 月）。

<sup>16</sup> 吳栢青，《張元濟及其輯印四部叢刊之研究》（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 年）。

<sup>17</sup> 劉怡伶，《張元濟思想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 年）。

<sup>18</sup> 蔡崇安，《張元濟經營商務印書館之研究》（臺北：私立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年）。

<sup>19</sup> 孫慧敏，〈翰林從商——張元濟的資源與實踐（1892-1926）〉，《思與言》，第 43 卷第 3 期（2005 年 9 月）。

多面向、蔡著鎖定張元濟經營商務印書館事業、孫文則論證張元濟成功轉型為出版業者之過程，其他亦有散見專書之章節者，如：蘇精〈張元濟涉園〉<sup>20</sup>、劉兆祐〈以文化報國的張元濟〉等<sup>21</sup>。這些研究不專就張元濟的政治立場而發，但檢視相關資料，其實張在經營商務印書館時，雖與現實政治保持相當距離，依舊關心時局，換言之，系統地考察張元濟在近代中國的政治立場及其思想底蘊，可再深掘。

本文即從所見相關文獻及新出檔案資料，如張元濟之嫡長孫張人鳳新編《張元濟全集》書信部分，對於已發現的張元濟晚年數通致中共統戰官員管易文的函札<sup>22</sup>，其中僅一函列入全集。檢視這幾封信，有請求中共當局為他延請醫師治眼疾、認購公債、捐獻私產等內容，這對瞭解張元濟晚年與共產黨的關係是頗重要的文獻。又，張元濟之孫女張瓏對於祖父在職工大會的受辱情況隻字未提，僅略言：

祖父是在出席商務印書館的工會大會發言時突發腦血栓中風的，當時商務人員把他緊急送往中美醫院搶救。<sup>23</sup>

這受辱背後的原因，實牽涉了晚年張元濟在大環境中的複雜處境，張元濟子孫對此略而不提或隱而不顯，應有現實顧慮。是故，本文在新出資料以及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進一步耙梳若干史實，探索張元濟在維新、立憲、革命、國共之爭的近代重要幾個時期的思考及作為，然不擬進行評議百日維新、立憲運動、辛亥革命等大論述，而鎖定於張元濟投入其中的若干具體作為、觀點，藉由問題式的釐清，一則精確解讀張元濟在這幾個重要時期的政治思想與傾向，另則從張元濟的角度去理解這些政治活動，並與同時代人物諸多對公眾輿論有影響的意見領袖（opinion leaders），如光緒皇帝、李鴻章、盛宣懷、嚴復、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胡適等之意見對辯，也聚焦張元濟政治立場之轉折及其權衡建言的底蘊，這部分較為過去所忽略，也是張元濟較不為人知的一面。

<sup>20</sup> 蘇精，〈張元濟涉園〉，《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年）。

<sup>21</sup> 劉兆祐，〈以文化報國的張元濟〉，《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臺灣書店，1997年）。

<sup>22</sup> 張元濟著，張愛平整理，〈張元濟晚年軼札七通〉，《檔案與史學》，第5期（1996年10月）。

<sup>23</sup> 張瓏，《水流雲在：張元濟孫女的自述》（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出版社，2007年），頁43。

## 貳、從維新到革命

### 一、期待清室振作的維新之士

維新運動，一般之界定分廣、狹兩義：狹者指光緒 1898 年 6 月下詔國是到同年 9 月政變為止的「百日維新」；廣者指自 1895 年甲午戰敗後一連串的改革運動至戊戌政變。張元濟在此役的具體作為與立場，有幾個值得注意的焦點：

#### （一）上書光緒皇帝的動機

某些研究張元濟的學者認為張元濟上書光緒的動機無法理解，所據的理由是：在上書之前，張元濟已感覺變法恐生變化卻仍有上書之舉，此令人「難以理解其動機」、「他的動機實在是個謎」<sup>24</sup>、「百日維新上奏的動機，……，至今仍存在著謎團」<sup>25</sup>。張元濟上書光緒的動機果真是「謎」嗎？仔細審視張元濟呈奏的內容以及辨析張元濟對光緒的情感，不難推尋其原委。張元濟分別在 1898 年 9 月 5 日與 9 月 18 日呈遞〈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為新政衙門酌設額缺，亟宜慎選賢能，以理要政而祛積習摺〉兩份奏摺<sup>26</sup>。前摺針對詔定國是以來的種種弊端提出抨擊，並提出五條總綱與四十條細目所構成的變法措施；後摺因清廷有意將裁撤的冗官安插到新成立而由張元濟所兼管的路礦局，張元濟認為不妥而再度上奏。檢視這兩份奏摺內容，康有為、梁啟超、李端棻、宋伯魯、楊深秀等人早在他之前即有類似的奏摺呈遞，如〈請改八股為策論摺〉、〈敬謝天恩並統籌全局摺〉、〈請開學校摺〉、〈條陳商務摺〉、〈請君民合治滿漢不分摺〉、〈請開制度局議行新政摺〉、〈請裁撤釐金片〉等，張元濟再度強調的用意何在？除了剖析推行新政過程中所遭遇的困難之外，並提出更具體可行的「正本清源」之道<sup>27</sup>，在〈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裡有五項總

<sup>24</sup> 汪家燾，《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頁 22-23。

<sup>25</sup> 鄒振環，〈張元濟研究概述〉，《浙江學刊》，總第 42 期（1987 年 1 月）。

<sup>26</sup> 關於〈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張元濟詩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年），孔祥吉質疑此摺作者應為張元濟與康有為兩人，非張元濟一人包攬，其言：「此摺正文部分，從內容與文句觀之，係由張元濟本人草擬，而其所附管見總綱及細目部分，則可能由康氏代擬。」其舉數例康有為為代人草擬奏摺為證，並指出「融滿漢之見」、「通上下之情」等係康有為一貫之變法建議與思想。見孔祥吉編著《救亡圖存的藍圖——康有為變法奏議輯證》（臺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8 年），頁 306-315。今暫存該說以備參。

<sup>27</sup> 〈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張元濟詩文》，頁 110。按：《張元濟詩文》誤植該摺呈遞時間為「一八九八年七月二十日」，應為「光緒二十四年七月二十日」或「一八九八

綱：一、設議政局以總變法之事；二、融滿漢之見；三、通上下之情；四、定用之人格；五、善理財之策。以設置議政局的觀點為例，張摺認為：

泰西各國行政與議政判為兩事，意至良，法至美也，中國則不然，以行政之人操議政之權，今日我議之，明日即我行之，豈能不預留地步，以為自便之計，故政為彼之所慣行者，必不廢，廢則無以抑新進之輩矣，政為彼之所未行者，必不興，興則顯形其前事之非矣。我皇上欲去一舊法，則多方阻撓，欲舉一新政，則故意延宕，未始不由於此，且變法之事亦非可易為也，必將徹究其終始，融貫其往來，斟酌其後先，權衡其緩急，而後能施之無弊，行之有功。<sup>28</sup>

至於議政局如何運作，張於摺中進一步指出：「此局宜仿懋勤殿南書房之例，設內廷」、「以年富力強，通達事務，奮發有為者充局員，統請特旨簡派」、「局事至繁，約以二十人為額。如不足請旨添派」、「在局諸員每日輪流，以數人一班，隨軍機大臣之後，聽後召見」、「請皇上於萬機之暇，隨時臨幸局中，考核各員所辦之事」、「遇有要事，諭知在局各員全數齊集，屆日請皇上駕幸局中，聽諸臣詳細核議」、「臣工調陳時事及各衙門請旨之件，概行交局核議，准駁各隨所見，議上請旨施行，至士民條陳，以後必多，亦可先交該局閱看」<sup>29</sup>以上張摺論點，與康有為向來主張相似之處，如康有為的〈請設議政處疏〉（代宋伯魯草擬），也提及了議政局之組織架構，康謂：

今擬略師泰西議院之制，仍用議政名目，設立議政處一區，與軍機、軍務兩處並重。令各省督撫舉實系博古通今、動曉時務，體用兼宏者各一人？令京官一品以上，共舉十人，無論已仕未仕，務限一月內出具考語，咨送吏部，引見後即充當議政員，以三十員為限。月給薪水，輪流住班，有事則集，不足則缺。凡國家大政大疑，皆先下議政處，以十日為限，急則三、五日議成，上之軍機王大臣；不可，則再議，軍機覆覈無異，乃上之皇上，而裁斷施行焉。蓋合眾通才而議一事，可決其算無遺策矣。<sup>30</sup>

年九月五日」。又，〈為新政衙門酌設額缺，亟宜慎選賢能，以理要政而祛積習摺〉誤植為「一八九八年八月三日」，應為「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十八日」或「一八九八年九月十八日」。

<sup>28</sup> 〈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張元濟詩文》，頁 111。

<sup>29</sup> 〈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張元濟詩文》，頁 112。

<sup>30</sup> 〈請設議政處疏〉，收入孔祥吉編著《救亡圖存的藍圖——康有為變法奏議輯證》，頁 25-26。

張之〈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康之〈請設議政處疏〉兩摺，均主仿設國外議院機構，無論選才辦法、要求通才抑或機構運作，不無相近之處。張元濟呈遞奏摺，以與康、梁等人呼應，擴大改革力量，形成眾議。

張元濟形容自己上書的舉動是「冒死上陳」<sup>31</sup>，其所以如此，主因有二：

第一、張元濟看出了變法受阻的癥結所在，其基於知識分子的使命感，認為有必要上達意見。張元濟說：「臣嘗悉心體察，知其中有受病最深之處，非洞見癥結，抉發掃除，雖日言變法，終涉皮毛而不能得其實際也。」<sup>32</sup>他窺悉了哪些癥結呢？例如光緒沒有運籌帷幄的幕僚，張氏言：

凡有交議，廷臣多不能仰體聖意，切實議行，或詭稱已辦，或極稱不便，無非欲暗行駁斥，即有一二議准，亦復支吾影射，貌合神離，迴失原奏本意，蓋諸臣賢愚不一，新舊殊途，各懷一兩不相下之心，而又不能獨行其是，故成此不痛不癢之公事。<sup>33</sup>

守舊諸臣或年邁或敷衍塞責或基於既得利益而不願配合，再加上沒有統籌變法的機構，致新政推行困難。又如滿、漢不洽，進以一氣對外，造成「海外各國，莫不聯群合盟以攻我」<sup>34</sup>，卻無法共同抵抗的窘境，滿、漢之分對於中國的傷害至大，其即云：「此為我國家受病最深之處，而又痛在廷諸臣只知忌諱，罔顧大局，莫肯一言，痛憤既久，不能復隱，謹昧死直陳。」<sup>35</sup>張元濟敢言別人所不敢言，冒死建言的精神有如其先祖螺浮公的翻版。這些尖銳的議題，早在三個月前張元濟受召時就有機會面陳，然當時「御座後窗外似有人影」<sup>36</sup>，為謹慎起見而未多言，然而隨著變法的進行，諸多弊端一一浮現，是故，張元濟強烈的使命感讓他無法緘口。

第二、張元濟深受光緒有心推動變法的精神感動，對光緒抱有信心，奏摺裡張元濟即言：「臣於本年四月二十八日蒙恩召見，仰見皇上憂國傷時，達於辭色。近又疊頒明詔，除舊更新，不惑於浮言，不撓於舊黨，竊以為聖明在上，提綱挈領，必能振已廢之人心，扶將衰之國運矣。」、「臣嘗讀五月二十八日上諭：至每待臣下以誠，而竟不以誠相應二語，未嘗不痛哭流涕。以為有君如此，臣雖粉

<sup>31</sup> 〈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張元濟詩文》，頁110。

<sup>32</sup> 同前註。

<sup>33</sup> 同前註，頁111。

<sup>34</sup> 同前註，頁113。

<sup>35</sup> 同前註。

<sup>36</sup> 〈追述戊戌政變雜詠〉其三之自註，《張元濟詩文》，頁59。

身碎骨，亦何足以爲報。諸臣乃置若罔聞，其心抑何忍耶？」<sup>37</sup>就個人情感言，光緒曾破格召見張元濟，其對光緒應有某種知遇情愫，因此對光緒有心革政卻得不到相對的回應格外同情，他的上書之舉實際也蘊含了對光緒之支持，希望皇帝能堅持改革的道路。在張元濟眼中，光緒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張元濟評道：「最難得的是這位生於深宮，長於阿保之手的專制皇帝，居然有新思想新見解。」<sup>38</sup>他曾舉兩件事例證明光緒「對於中國是有希望的人」<sup>39</sup>，說道：

德宗喜歡看新書，差不多天天都有條子到衙門裡要書，都是我承辦的，這是一件。那時我們已經承認朝鮮國自主，派公使去，要遞國書，總理衙門進呈國書的稿子，將大清大皇帝高一格寫，朝鮮國國王低一格寫，被德宗批駁，斥為腐敗，不合對自主國的體制，這硃批是我目睹的，這又是一件。<sup>40</sup>

「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光緒，在長期處在慈禧威權底下，雖然找到「變法」這一個宣洩出口<sup>41</sup>，但終究迫於「強勢母后，弱勢皇帝」的懸殊對比，一個沒有實權的年輕皇帝自己也坦言「舊黨之阻撓，八股試帖之無用，部議之因循扞格，大臣之不明新學」<sup>42</sup>，像這樣艱困的局面，又如何能期待光緒在日趨僵化的國家機制下有所作爲呢？誠如余英時所云：「光緒連自保的力量都沒有，最後尚須乞援於康有爲等，他怎麼可能主持變法，推行從上到下的全面政治改革呢？他只是滿洲統治階級中一個游離出來的分子，是國家機器中脫落下來的零件。」<sup>43</sup>因此，就變法能否成功的意義來說，張元濟寄望光緒，並把他當作政治上的核心人物，不免流於主觀，但若提升到救亡的愛國層次論，張元濟上書之舉實不難理解。

<sup>37</sup> 按：張元濟誤記，此諭應為陰曆五月二十七日而非二十八日，即 1898 年 7 月 15 日。光緒命各省督撫確實查察裁兵狀況，然而各督撫均不當一回事，光緒則下此諭而重令之，希望督撫們能配合，此見《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70 年），第 420 卷。另參《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第 8 種：戊戌變法」，第 2 冊，頁 39。

<sup>38</sup> 〈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開幕式上致詞〉，《張元濟詩文》，頁 226。

<sup>39</sup> 同前註。

<sup>40</sup> 同前註。

<sup>41</sup> 有關光緒的個人意志被慈禧摧殘的具體事例，參見余英時〈戊戌政變今讀〉，收入《二十一世紀》第 45 期（1998 年 2 月），頁 4-14。按：在權威下成長的人格，就心理學分析，表面服從，但背地反對最甚，斐魯恂（Lucian W. Pye）說：「年輕人反抗父母威權的另一個方式是：一方面在表面上順從地接受父母的權威，另一方面又盡力在父母控制以外的地方追尋個人的人格發展。」見 Pye, Lucian W. 著、艾思明譯《中國人的政治心理》（臺北：洞察出版社，1988 年），頁 96。

<sup>42</sup> 〈致汪康年〉，《張元濟書札》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年），中冊，頁 652。

<sup>43</sup> 余英時，〈戊戌政變今讀〉，《二十一世紀》，第 45 期（1998 年 2 月），頁 12。



## （二）「漸進」或「急進」的變革選項

張元濟之投入維新運動採取了務實、漸進的方式，以康有為奏議設置「制度局」為例<sup>44</sup>，張、康二人的看法即有差異，康主張「制度局」設立的前提是盡廢軍機、內閣等單位以利統一事權，然而這種動搖既得利益者的改革，其受到強大抵制是可以預見的，張明白指出康過於躁進且不得要法，他認為設局之事不可驟行，應該先由總理衙門統籌，並於署中編制數股以專理新政，漸進實施，雖無制度局之名而有制度局之實，待時機成熟、各方面有頭緒時，再正式開局<sup>45</sup>，此種不貿然以新代舊的階段性改良主張，即張元濟反對非輸即贏的「零和」（zero-sum）思考模式——即一方（新黨）要贏就必須減損另一方（舊黨）的利益，因為，這兩種極端的總和為「零」。為追求最大的變革效益，張元濟認為必須將施行步驟及相關配套措施周密規劃，否則易遭反彈。<sup>46</sup>

康有為力吹「速變、全變」，在光緒還沒下詔定國是之前，曾在京師組織保國會，先後至廣東、廣西等會館發表保國及保種的演說，張元濟曾前往聽講，對康有為留下這樣的印象：

其意在聳動人心，使其思亂，其如何發憤，如何辦法，其勢不能告人，……，康在桂管刻俚言書多冊分送，其中說話亦無甚奇，惟每說及己，則稱康子，而康字必大於餘字數倍。<sup>47</sup>

另一同期人物汪大燮也在寫給汪康年的信中，提到康有為宣講的狀況：「同人有赴者，聞其言，自始自終無非謂國家將亡，危亟之至，大家必須發憤。而從無一言說到辦法，亦無一言說到發憤之所從。」<sup>48</sup>極明顯，在他們眼中，康有為是位熱情且過度自信的改革者，同時似乎予人光說不練的「不實在」感覺，簡言之，其有「抽象的感性」卻乏具體的落實<sup>49</sup>，就連他親近的胞弟康廣仁也說他「規

<sup>44</sup> 參康有為，〈應詔統籌全局摺〉，《康南海自編年譜》（臺北：廣文書局，1971年），頁43。

<sup>45</sup> 〈致沈曾植〉，《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頁676。

<sup>46</sup> 例軍機大臣甚至揚言「開制度局，是廢我軍機也，我寧忤旨而已，必不可開。」見《康南海自編年譜》，頁58。

<sup>47</sup> 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年），頁25；另參《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冊，頁782-783。

<sup>48</sup> 汪大燮，〈致汪康年書〉，《汪康年師友書札》，第1冊，頁782。

<sup>49</sup> 「抽象的感性」一語借自林安梧，見其〈「抽象的感性」下的變革論者——以康有為為例的精神現象學式的哲學解析〉，《中國近現代思想觀念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年），頁207-232。

模太廣，志氣太銳」<sup>50</sup>，而門弟子梁啟超則言「先生最富於自信力之人也，其所執主義，無論何人，不能動搖之」<sup>51</sup>。

相較康有為的虛浮自大與激情，張元濟在衡量政局變化與改進之道方面，就顯得冷靜、溫和、務實，以開設學堂之事而言，張元濟與康有為均主張廢科舉、開學堂，在兩人各自上奏的意見中也都做了宣示，但特別的是，張元濟躬自實踐辦了西學堂，而康有為卻一再只對高層暢揚其言，既無視大環境的變化，亦少紮實的動能，1898 年 8 月前後張元濟曾勸康有為趁皇帝下詔各省廣開學堂之際，暫離政壇以避風頭（時維新大員翁同龢已被逐回籍），並藉辦學以培養更多的變法人才，張元濟對康有為說：「出京回籍，韜晦一時，免撻眾忌，到粵專辦學堂，搜羅才智，講求種種學術，俟風氣大開，新進盈廷，人才蔚起，再圖出山，則變法之事不難迎刃而解。」<sup>52</sup>張元濟的提醒，所得的回應是：「長素不聽，且陳奏不已，益急進，致遂有八月六日之變。」<sup>53</sup>

思慮欠周密、一意孤行、躁進，若說是康有為人格上的一大特徵，似不悖實，張與康同屬維新志士，以裁汰冗官、改官制、廢科舉的立場為例，張元濟認為：「現在宜多裁舊衙門，增設新政衙門。有軍機處何必有內閣？有大學堂何必有國子監？皆重沓無謂。翰林院人員最眾，所辦事件與國計民生毫無關係，太帝（筆者按：「帝」應為「常」字之誤）寺專司祀典，亦可併入禮部，或恐此項人員廢棄可惜，則拔其才可用者，入新政衙門當差。」、「舊存暨新設各衙門，所有官制，應請飭下議政局，重加釐定，請旨施行。」、「今之裁官為人冗糜帑也，若科舉不停，三年之後，文武又增數百人矣，何必多此一番裁撤哉？或謂科舉廢，則賢才無由表現，不知已奉旨設立學堂，明明有進身之路，此本疊牀架屋之事也。故裁冗員，不能不廢常科。」<sup>54</sup>再對照康有為於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1898 年 8 月 29 日）呈奏的〈為釐定官制分別官差，以高秩優耆舊，以差使任賢能摺〉，其云：

竊聞朝議紛紜，多有議釐定官制並裁冗署者，臣以為言之是也，而今行之，非其時也。夫立政變法，有先後輕重之序，若欲釐定新制，須總籌全局，若者宜增，若者宜改，若者宜裁，若者宜併，草定憲法，酌定典章，令新政無遺，議擬安善，然後明詔大舉，乃有實益，若稍

<sup>50</sup>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世界書局，1972 年），上冊，頁 58。另見收入張元濟主編《戊戌六君子遺集》之康廣仁《康幼博茂才遺稿》。

<sup>51</sup> 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飲冰室文集》之六（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 年），第 2 冊，頁 87。

<sup>52</sup> 〈追述戊戌政變雜詠〉之五自註，《張元濟詩文》，頁 57。

<sup>53</sup> 〈戊戌奏稿跋〉，《涉園序跋集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年），頁 128。

<sup>54</sup> 以上〈痛除本病，統籌全局，以救危亡摺〉，《張元濟詩文》，頁 114-115。

革一二，無補實政，似非變法先後輕重之序也。然統籌全局，改定官制，事體重大，不能速舉也。……兵、財、學校皆非改官制，別官差，無由整頓也。《論語》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昔光武以高秩厚禮，允答元勳，峻文深憲，責成吏職，故開國功臣，皆予特進奉朝請，雖以鄧禹之才，亦不任職。宋太祖亦用此道，故當時功臣皆不掛吏議，保全始終。既有勞於前，亦當恩禮於後，論者以為君臣交得焉。今法弊至此，欲行新政，臣以為采用三代官爵分途之制、宋及日本專用差使之法、漢、宋優待功臣之義。伏祈皇上推行新政，先注意差使，令各政皆別設局差，如軍機、議署之列，選通才行走，如宋及日本法。自朝官以上，不拘資格任之，去卿貳大臣，方任專差之例。若以積習相沿，驟難變易。則凡此專差人員，皆賞給京卿、御史職銜，准其專摺奏事，自辟僚佐。其每直省亦派通才一人，辦理新政，體制亦同。若不設新局，則每衙門皆派人行走。其帶本衙門之官，照各部實缺郎中、員外例。其無掌印、主稿之差者，不到署辦事者聽。凡官不得兼差，其有樞垣、譯署、管學等差者，亦無庸到本衙門辦事。其年較耆老者，不必勞以事任，賞給全俸，令奉朝請。如此則耆舊得所，人才見用，新政能行，而自強可望。<sup>55</sup>

裁撤舊署及冗員問題上，張、康的態度略見差異，張元濟力主裁舊新增，而康有為則認為新增為宜、不輕易裁撤、妥善安排耆舊。裁汰冗署，勢必波及多人生計，張元濟的速裁立場，顯然較康有為緩裁或不裁的態度激烈，據此，若謂張元濟是漸變而康有為是急變之二分法，確嫌粗略。但整體而論，張元濟顯然是相對的溫和漸進派，張元濟的理解中，變法的挫敗與康之躁進脫不了干係，康有為沒有接受張元濟「勿再進言，姑出京，盡力於教育」的建議<sup>56</sup>，致使變法夭折。

弔詭的是，這好比一體的兩面，就因為此種衝動的性格，所以康有為能義無反顧掀起變法運動，然而也因這種思前不顧後的過度自信，讓變法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張元濟評道：「康固非中正人，然風氣之開，不可謂非彼力。」<sup>57</sup>張元

<sup>55</sup> 〈為釐定官制分別官差，以高秩優者舊，以差使任賢能摺〉，收入孔祥吉編著《救亡圖存的藍圖——康有為變法奏議輯證》，頁 225。

<sup>56</sup> 〈戊戌奏稿跋〉，《涉園序跋集錄》，頁 128。按：張元濟於 1944 年 10 月為陳思明得三十二通康有為於復辟前後致沈增植書信題詞中說道：「余與長素政見不盡相合。戊戌變法，詔罷科舉、設學堂，余勸其南下一意興學，長素不從，急進不已，卒釀八月六日之變，至日落虞淵，余以為絕似日揮一戈之事，故復辟之事一無所知。然二公惓惓於故國故君之意，至可敬、亦可悲也。」（〈為陳思明題康長素書札〉，《張元濟詩文》，頁 350）這段話透顯了幾個意義：一、張元濟有責怪康有為因急進而使變法失敗之意；二、張元濟自陳沒有捲涉復辟事件；三、對於復辟之事，張元濟是持同情康有為與沈曾植之立場。於此可見，張元濟與康輩已非同道，審查人表示這可能是張元濟見到康有為復闢的事後之詞，筆者同意。

<sup>57</sup> 〈致汪康年〉，《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頁 652。

濟對於康有為本人的氣性並不很肯定，嚴復也曾說康有為「輕舉妄動，慮事不周」<sup>58</sup>，錢穆則謂「領袖慾至高、自信力至強之人」<sup>59</sup>，但在康有為推動變法的領導之功方面，不管是張元濟還是後世素以研究康有為著稱的蕭公權、汪榮祖、湯志鈞等人，評價倒是趨向一致，亦即多肯定康在維新時期所掀起的改革風氣<sup>60</sup>。

### （三）對戊戌政變的思考

張元濟所留存下來的文獻中，有兩處較詳細地提及他對政變發生的看法，一是：

夫以數千年之古國，一旦欲效歐、美，變易一切，誠非易事。然使無孝欽后之頑梗，又無庸劣守舊之大臣助長其燄，有君如此，上下一心，何至釀成庚子之役。即辛亥之革命，亦何常不可避免，和平改革，勿傷元氣，雖不能驟躋強盛，要決不至有今日分崩之禍。<sup>61</sup>

又：

假使沒有這政變，就不會有庚子的義和團，因為這義和團完全是西太后和那些頑固昏庸的大臣製造出來的，倘然沒有戊戌的政變、庚子的義和團，人民對朝廷的觀念不同，也許不會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會造成一個袁世凱，演出那一套洪憲的笑話，更不會有後來各省軍閥的火併和割據。<sup>62</sup>

這兩段文字乃是張元濟晚年對「戊戌政變」的總看法，自之可以看出張元濟變法思想的底蘊：一、政變發生對中國政局影響深遠，可以說是中國一連串災難混亂的啓端，簡言之，他認為政變的發生與否，實為中國近代政治轉折的關鍵點。二、在既有的國家機制上進行和平改革，不主張打倒滿清政府，亦即對清廷仍抱希望，換言之，他對中國政體的態度傾向君主立憲制。

<sup>58</sup> 嚴復，〈與張元濟書〉，收入嚴復著、王杖《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3冊，頁533。

<sup>59</sup>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年），下冊，頁785。

<sup>60</sup> 詳參蕭公權《康有為思想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年）、汪榮祖《康有為》（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湯志鈞《康有為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年）等書。按：蕭、汪、湯三人雖多肯定康有為維新時期的作為，但在變法失敗後的評價就較為分歧，蕭、汪持同情理解，湯則視事件不同給予正負兩面評判。

<sup>61</sup> 〈戊戌奏稿跋〉，《涉園序跋集錄》，頁128。

<sup>62</sup> 〈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開幕式上致詞〉，《張元濟詩文》，頁227。

究柢而論，張元濟基於對光緒的信任，對變法運動抱以高度期望，然而即使排除慈禧等守舊勢力頑抗這項主因，其他維新人物能否真的「上下一心」共同推動新政？答案顯然是是否定的，單就維新一派，就有漸進與急進之分，同樣訴求卻常兩樣步驟，尤其急進的康有為「操之過急」，未慮及因制度、規範的全面改定所引起的不安與不適，致使改革橫生枝節，職是之故，變法充滿了變數。後來張元濟檢討失敗的原因也坦承說：「在當時環境之下，戊戌變法的失敗是必然的，斷斷無成功的可能，當時我們這些人要借變法來挽回我們的國運，到後來才知道是一個夢想。」<sup>63</sup>又說：「時機全未成熟，當時頑固勢力尚盛，同志諸人知其不可而為，至今思之，真可謂痴心妄想耳。」<sup>64</sup>此外，張元濟從制度面「變法」而不根本「變政」的想法，實有深意存焉。蓋在原有的清政府框架上，逐步進行改革，是顧全大局且付出代價最少的方式，對中國最為有利，行政革新已屬不易之事，伊藤博文也曾對張元濟說：「一個國家要變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sup>65</sup>如果連政體都一併改易，那麼勢必要重新建立新的公認權威中心，然而麻煩的是，清廷推倒了，誰能繼之？屆時各方又因爭奪「君位」致社會動盪不安<sup>66</sup>，中國已窮於應付外患，若內爭再啓，不啻雪上加霜，遑論挽救國勢。再者他主張滿、漢一家，滿、漢二族對外而言都是中國人，因此無論誰當家，他認為並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救國強國的關鍵點在於全國國民素質程度之優劣，亦即要使中國脫離內憂外患，啓民智才屬當務之急。張元濟這種傾向不改政體的信念在辛亥革命前為止，一直堅持，雖然中經庚子事變，張元濟一度對清廷失望，也曾勸李鴻章不要再替清廷效力<sup>67</sup>，但基本上，張元濟從維新到立憲時期，出於安定大局考量而沒有排斥清廷，甚至對它還存有若干幻想與期待。

## 二、辛亥前後的兩種變革取向：從改良到革命的轉變

從光緒二十四年到宣統三年（1898-1911），此逾十年的時間，張元濟的政治傾向是有所調整的，以 1911 年辛亥革命成功為分水嶺，大致而言，辛亥革命之前的立憲活動是一個立場，革命成功後則移轉了。不論何者，被革職後的張元

<sup>63</sup> 〈戊戌政變的回憶〉，《張元濟詩文》，頁 237。

<sup>64</sup> 〈致李廷燮〉，《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頁 517。

<sup>65</sup> 〈戊戌政變的回憶〉，《張元濟詩文》，頁 235。

<sup>66</sup> 劉再復說：「一旦去掉『君』這個符號，中國就爭鬥個沒完沒了。」見劉再復與李澤厚合著《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年），頁 98。

<sup>67</sup> 張元濟說：「庚子年議和團事變發生時，李鴻章任兩廣總督，當時西太后殺了五大臣，兵部尚書徐用儀、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戶部尚書立山、內閣學士聯元，後八國聯軍陷北京，西太后和光緒避難到西安，一面叫李鴻章北上議和，李經過上海時我去見他，勸他不必再替清朝效力了。他對我說，你們小孩子懂得什麼呀，又說我這條老命還拼得過。後來議和未竟，他就去世，未能觀成。」〈戊戌政變的回憶〉，《張元濟詩文》，頁 237。

濟，在這個時期已不在政治舞臺上，然而他仍然充滿知識分子的社會責任意識，關注時局的發展與人民的福祉，他扮演了什麼樣的角色並起過何種作用？他的態度有何值得注意之處？

### （一）辛亥革命前主張君主立憲

君主立憲運動，依一般之界定，乃起於 1905 年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外國政治以至辛亥革命為止。然而嚴格溯源，其實君主立憲的醞釀與倡導，在甲午之前即已出現，例如：王韜、鄭觀應等人主張的「君民共治」、「君民共主」，到了維新運動，康、梁已有立憲召開國會的建議，而張元濟主張設置「議政院」改良政府行政的職能，實含西方行政、立法、監督三權分立的概念，隱然指向君主立憲體制。

戊戌維新失敗後，中國內憂外患有增無減，1900 年正值中國多事之秋，北方教案、庚子拳亂、八國聯軍直搗京師，而慈禧以光緒名義所推動的新政對於危在旦夕的中國，也未發生具體的成效，於是一連串以立憲取代專制的呼聲漸大，包含張元濟、嚴復、康有為、梁啟超、張謇在內的許多志士一方面痛心清廷的腐敗專制，另一方面又對暴力革命有所戒懼，遂傾向折衷的立場——主張君主立憲。在國內，以實業家張謇為倡導最力；在國外，以戊戌政變後奔走日本的梁啟超和康有為鼓吹最勤。

#### 1. 促成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

戊戌時期，張元濟在上呈的奏摺中，已有憲政思想的體現，例如他主張當時已推行的新政，應「垂為國憲」，以利事權劃一，並「令在局各員詳考西國制度」以為參考。而 1903 年末，日、俄兩國為了奪取中國東三省與朝鮮利益，在中國境內開戰，清政府卻宣布中立，不予聞問，對於要求中國獨立自主以及關心東三省人民安危的志士，此無疑是一項大刺激，張元濟遂同張美翊、趙鳳昌、張鶴齡、夏曾佑、呂景端等江、浙士人提出遣使各國的建議——一則聲明東三省主權，二則考察憲政，先後向盛宣懷、岑春煊、張之洞、瞿鴻禨等有力人士陳請上奏，促成了 1905 年載澤、李盛鐸、尙其亨、戴鴻慈、端方五人出洋考察。<sup>68</sup>

<sup>68</sup>關於五大臣出洋始末，參見伊杰〈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動因及其演變過程〉，《近代史研究》，總第 51 期（1989 年），頁 102-115。

## 2. 對督撫勤王及東南自保的看法

1900年清廷下詔對各國宣戰，北方動亂不已，慈禧通諭各省督撫「保守疆土，接濟京師，聯合一氣，共挽危局」<sup>69</sup>，針對此事，張元濟認為拳亂致「北方糜爛至此，咎實在我頑固政府」<sup>70</sup>。時張元濟正逢母喪<sup>71</sup>，卻仍憂心國是，曾約友人吳綬卿、陳錦濤、溫宗堯諸君至寓所謀「安定之策」<sup>72</sup>，唯自八國聯軍攻陷大沽口後，南方亦惶惶無日，張元濟指出雖然南方督撫有保護中央之義而且也是應盡之職，但畢竟此禍係由慈禧偽政府惹起，北方局勢複雜已恐難善了，若再牽扯南方督撫勢必擴大爭端，故張元濟認為「目前實無可以入京之勢」<sup>73</sup>，另一方面他從務實面考慮廣大民眾的利益指出：

南方今日交涉似不宜僅以保護為事。各國何以徵兵，為我殄孽也，則宜有以饗勞之。外人何以受困，由我之無道也，則宜有以撫恤之。南方各省，似宜勉力互籌數百萬金充此兩項之用。明知巨款虛糜，然未始不可少平外人之氣。將來洋兵入京辦理各事，於極不和平之中，或可望其稍留體面。即至不堪設想之時，而東南遺民亦可稍免壓抑之苦。至各國調兵，現以日本為最多，似宜暗與聯絡，由是而英，而美，以為外交之根基，以為後日斡旋之地步。<sup>74</sup>

簡言之，張元濟主張督撫不要與外人交惡，甚至友善待之，以預留中國戰敗後的談判空間。至於督撫勤王與否的看法，張元濟認為中央製造出的問題，由地方協助收拾，反而會引發更複雜的局面，他說：

此勤王之舉，非徒無益，而又有害者也。徒博一時之美名，而不顧後來之禍變。元濟誠不解主此事者之出於何心！此時此事禍猶未甚，數月而後朝局一變，各省疆臣有一於此，由南方必大擾亂。裕壽帥（筆者按：李鴻章）尚非全無知識之人，且有攻擊租借之事，況南方督撫固明明有媚嫉洋人者乎。彼時再假忠義之名，以泄其一時之忿，則官軍、洋兵、土匪必至融成一片，參互錯綜，亂無已時。<sup>75</sup>

<sup>69</sup> 轉引自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年），頁385。

<sup>70</sup> 〈致盛宣懷〉，《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下冊，頁1006。

<sup>71</sup> 「母謝太夫人病歿，終年55歲」，見《張元濟年譜》，1900年6月27日條，頁34。

<sup>72</sup> 張元濟說：「拳亂方熾，綬卿與陳君錦濤、溫君宗堯會於余居，謀所以安定之策。」見其〈吳綬卿先生遺詩序〉，《張元濟詩文》，頁292。

<sup>73</sup> 〈致盛宣懷〉，《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下冊，頁1007。

<sup>74</sup> 同前註，頁1006-1007。

<sup>75</sup> 同前註，頁1006。

張元濟贊成君憲制，卻不主張南方包含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諸督撫北上勤王，可見在庚子之際，張元濟對清室相當失望。而在保護東南省民的安全上，張元濟主張要積極，他說：「政府一蹶，東南各省必亂事蜂起。哀我生民何堪遭此荼毒。竊謂禍亂之來，雖關天意，人力未始不可小有挽回。」<sup>76</sup>於是他向督辦鐵路大臣盛宣懷建議：「我公負天下重望，且為各國所引重，似宜速興各省有識督撫聯絡，亟定大計，以維持東南大局。」<sup>77</sup>張元濟呼籲應有所作為以挽回局面，冀由盛宣懷出面整合南方督撫，以保護省民。

### 3. 支持清廷「預備立憲」

在清政府下詔「預備立憲」前，有一段的醞釀推動的過程，1899 年康有為由日轉赴加拿大創「保救大清皇帝會」（保皇會、中國維新會、國民憲政會），梁啟超則先後在日本、檀香山等地辦報撰文鼓吹君主立憲，著名者有《清議報》、《新民叢報》，梁並與另一變革團體「革命派」所辦《民報》進行立憲共和、改良革命等議題之筆戰。

張元濟正式投入這場立憲運動前也曾於 1900 年 7 月參加正氣會（自立會）召開的「中國議會」，該會主張不承認通匪矯詔以慈禧為首的偽政府、聯絡外交、平內亂、保全中國自立、推廣中國未來之文明進化，而與會人士多為維新時期的支持者，雖然維新宣告流產，但這群有志者卻未因此消散，反而組會尋求另一改變中國政治的機會<sup>78</sup>。

1903 年張謇遊歷日本回國後，對日本實行君主立憲深刻印象，他說：「日、俄之勝負，立憲、專制之勝負也。」<sup>79</sup>日本明治十四年（1881）宣布立憲，結果日俄戰爭打下來，立憲的日本打敗專制的俄國，顯然日本行君憲獲致成效，更鼓舞立憲人士的信心，而五大臣考察歸國後，對於君憲制也有了更深的認識，載澤即呈奏〈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載澤奏請宣布立憲密摺〉舉列立憲好處：一、皇位永固，二、外患漸輕，三、內亂可弭。<sup>80</sup>終於 1906 年 9 月清廷下詔「預備立

<sup>76</sup> 同前註，頁 1005。

<sup>77</sup> 同前註。

<sup>78</sup> 另須指出，該會成立自立軍，有主起義後宣布民主，有主仍擁光緒，有主擁張之洞獨立，識見不一。

<sup>79</sup> 轉見伊杰，〈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動因及其演變過程〉，頁 107。

<sup>80</sup> 載澤，〈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載澤奏請宣布立憲密摺〉，收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主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79 年），上冊，頁 173-176。另見方學堯譯註《清末立憲運動文選譯》（四川：巴蜀書社，1997 年），頁 114-124。載澤又指出君主立憲政體，有利國家人民但最不利於官吏，因既得利益勢必受到剝奪，有些官員基於保護個人私慾，反製造言論，認為君主立憲是損害君主的權力。載澤認為這些言論不察立憲真義，因立憲的本意即在尊崇國體、鞏固君主權力，而非損害君權。



憲」，同年 12 月，張元濟與商務印書館同仁高夢旦、夏瑞芳、李拔可、印有模、高鳳岐等人參加張謇、湯壽潛、鄭孝胥等紳商在上海所發起之「預備立憲公會」<sup>81</sup>，張元濟擔任該會董事，倡議地方自治、設宣講所「宣講憲法，以多造成立憲國民之資格」<sup>82</sup>，為君憲制進行催生。

#### 4. 對清廷頒布「憲法大綱」的論點

1908 年 8 月清廷頒布「憲法大綱」，訂定預備立憲時間為期九年，然而此綱領在時間以及內容方面，引起張謇、湯壽潛、梁啟超等立憲派的反彈，認為預備時間過長，且內容重君權輕民權，質疑清廷沒有立憲的誠意。時在日本考察的張元濟得知清廷頒布「憲法大綱」後，寫信給商務印書館同仁談到他對這件事的看法：

購得《朝日新聞》、《時事新報》。讀之知開設國會期限已定九年，議院法及選舉法亦已宣布，皇上並於今日誓廟。在海外聞此消息，不覺欣喜。但不知其言果可恃否？報中又有「欽定憲法」字樣，此事恐為將來禍根。然能為禍與否，究視吾民之如何自待。平心而論，九年之說誠不為遲，但求上下一心。實力準備，庶免為各國所嘲笑耳。國內輿論若何？鄙見此時國民不必再與政府抗爭，姑且返求諸己，將應辦之事一一舉行，二三年後稍有端緒，若得機會再行爭辯未為失時，未知諸公以為如何？預備立憲公會現在定何方針？鄙見不宜隨聲附和，宜時時從高一層著想，以為國民之嚮導。<sup>83</sup>

要明瞭張元濟對立憲運動的態度，這是一件很重要的資料，其中透露了幾個訊息：一、懷疑清廷施行的誠意，但卻又不反對清廷的做法；二、延續維新時期的溫和漸進方式，主張躬自實踐；三、從大局處著眼，認為預備立憲公會不宜跟著其他急進立憲派起舞，憲法大綱「九年之說誠不為遲」。極明顯，雖然他對清廷變革的決心有所保留，然而基本上張元濟乃站在清廷一方說話。

仔細分析張元濟此一立場，隱含了兩種矛盾的心態：一方面他看出清廷頒布「憲法大綱」之冠以「欽定」二字，意味著清廷仍以專制自居，擔心引起反彈；另一方面著眼政局安定，寬容清廷，而對施行立憲進程的時間，他認為「九年之說誠不為遲」，甚至要民眾配合「不必再與政府抗爭」。張元濟這樣的態度與新運動時期大體一致，依舊是溫和、漸進，但若放在大環境觀之，相較張謇、梁啟超

<sup>81</sup> 該會「以發憤為學，合群進化為宗旨」、「使紳民明悉國政，以預備立憲為基礎」，《張元濟年譜》，頁 34。

<sup>82</sup> 〈法學協會雜誌序〉，《張元濟詩文》，頁 291。

<sup>83</sup> 〈致高鳳謙、陶惺存、杜亞泉〉，《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下冊，頁 962-963。

等立憲派人士的積極，似乎是「前進中的保守」<sup>84</sup>，在頒布「憲法大綱」前，清廷查禁了梁啟超所創辦以速開國會為主訴求的政聞社，意圖打壓立憲人士，而張元濟卻認為不要再與政府抗爭，當然這是他出自避免與清廷正面衝突、降低社會成本而發，然而，在人心思變日亟的彼時，張元濟持續對清廷寬容，反映了他與客觀時代潮流背反的保守與侷限。

### 5. 透過出版以宣揚立憲

張元濟的業師朱福詵曾上奏〈請開設議會以維國勢而固人心摺〉，指出內政外交上種種亂象乃緣自於沒有健全的法律規範，而改善的根本之道在速開國會，使中國成為法治國家，其言：「夫惟法治之國，用人行政，一一皆在法律之內，而欲為法治之國，則非開設議會不為功。」朱福詵並從中國的獨立自主、解決財政、監督政府、協助國務、人民責任感等方面論說開議會的好處。<sup>85</sup>成立國會必先要具備相關的法律知識，但這些知識如何取得？張元濟以出版法政書籍的方式，解決了這個問題。張元濟對圖書出版有著細密的考量，他說：

政法書籍亟宜著手編譯，為公為私均不可緩。……，鄙意尤重在先編淺近諸書，層層解說，如何為議院，何為選舉，每類一冊（如條目過繁者即分數冊亦可），排列次第，如第幾集第幾編之類，成一叢書，專備內地紳士入門研究之用，文字宜稍優美而解釋務宜明晰，理想切戒過高。<sup>86</sup>

秉持循序漸進、切實可行的方式，張元濟編印有關憲政與地方自治新書，先後在南洋公學譯書院以及商務印書館推出，例如出版《日本法規大全》<sup>87</sup>、《立憲國民讀本》、《十六國議院典例》、《日本議會法規》、《自治論》、《地方自治淺說》等書<sup>88</sup>，此外，張元濟也邀人撰文宣說，如請嚴復撰〈論英國憲政兩權未嘗分立〉<sup>89</sup>；又創辦了以「冀上助憲政之進行，下為社會謀幸福」為宗旨的《法政雜誌》等等<sup>90</sup>，此皆張元濟在推廣憲政思想方面所做的努力。

<sup>84</sup> 此借吳方語，見吳方《仁智的山水——張元濟傳》（臺北：業強出版社，1995年），頁97。

<sup>85</sup> 朱福詵：〈侍講學士朱福詵請開設議會以維國勢而固人心摺〉，《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頁623-626；另見方學堯譯註《清末立憲運動文選譯》，頁125-136。

<sup>86</sup> 〈致高鳳謙、陶惺存、杜亞泉〉，《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下冊，頁962-963。

<sup>87</sup> 1907年初商務印書館出版《日本法規大全》，凡八十一冊，四百萬字，張元濟並親撰序文。

<sup>88</sup> 見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年），頁52-54。

<sup>89</sup> 該文連載於《外交報》，而文末有編者按語曰：「自七月十三日奉預備立憲之明詔以來，舉國上下，喁喁望治，乃特商之侯官嚴先生，撰登此文焉。」見《嚴復集》，第1冊，頁218。

<sup>90</sup> 〈法學協會雜誌序〉，《張元濟詩文》，頁291。

## 6. 促請奕劻速訂立憲補救辦法

1910年張元濟進行了一次環球之旅，途中寫信回國內給友人沈曾桐，提到在倫敦時遇到英國國王愛德華七世生病以及去世的事情：

到倫敦後不數日即遇英王之喪。先一日元濟偶經其宮門，見民人之踵門問疾者，絡繹不絕。醫官頻頻宣布病狀，聞一凶訊，則嗟嘆之聲相續。立憲國君民之相親固如是乎！<sup>91</sup>

由此看來，在革命前一年張元濟還是心慕君主立憲制度，對於英國君憲制能施行成功以及英國君王與子民之間的情感深厚，印象深刻，回觀中國立憲的未來，他抱著更深的期望，辛亥革命發生前的半年，張元濟曾上書慶親王奕劻，他說：「我國採用立憲政體，無非為救亡圖存起見。然三年以來，舉行憲政，大都有名無實。為今日計，惟有速定方針，以為補救之策。」<sup>92</sup>此摺呈奏時間已是立憲運動末期，張元濟提出了五項「行政宗旨」以及理財、外交、民政、教育、實業、交通、司法、軍備等八方面政策<sup>93</sup>，然而奕劻並未接受。

從維新運動到立憲運動，張元濟先後兩次上書，向清政府高層提出改革之道，陳說對象一為光緒，一為奕劻，兩次呈遞的時間也都在運動末期，可見他對清廷仍抱希望，然而兩番試圖挽回的努力皆未獲支持，這使他尊清的情感遭到了嚴重的挫折，清廷組皇族內閣實行假立憲、真專制，讓期待清廷挽救國運的張元濟徹底失望，於是，他做了調整——傾向革命。

### （二）辛亥後的民主共和傾向

長期對清廷存有期望的張元濟，在上書奕劻後，由於得不到善意回應，遂重新思考當初所堅持的看法，雖然他不認同革命派以激烈暴力手段，然而1905至1910年間清廷出賣路權向外人借款之舉，卻讓張失望至極，依其看來，滿清確實已無可救藥，且客觀環境已形成一股不可抑遏的革命浪潮，試圖挽救清廷的努力既已無效，原本主觀期待清廷改革的立場，遂有了轉向，在繼續擁護清室與建立新的政權之間，他選擇了後者。

<sup>91</sup> 〈致沈曾桐〉，《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頁679。

<sup>92</sup> 〈上慶親王手摺〉，《張元濟詩文》，頁163-167。

<sup>93</sup> 五項行政之宗旨為：宜審察國情以握行政之綱、宜劃定區域以作行政之標準、宜掃除舊習以清行政之根源、宜表明誠意以結國民之感情、剛斷行之以示政府之威信。見張元濟〈上慶親王手摺〉，《張元濟詩文》，頁163-167。

張元濟政治立場之改變，皆出自於對全民福祉的考量，立場的轉換並不代表他心中那個挽救中國最高的理念一併改易，如前辨析，他對中國體制並無一定的堅持，何者能真正帶領人民脫離危亡的深淵，何者就是可以接受的政體，而從他晚年的〈新治家格言〉當中對於民主體制的肯定來看<sup>94</sup>，能實行法治的民主體制之政體應該是他理想中的範型。

當初許多堅持君主立憲的人，如：康有為、鄭孝胥、張謇、梁啟超、沈曾植等人，在革命成功後仍戀棧清皇，而張元濟卻不再回頭，例如康有為輩復辟事件，張元濟雖同情他們，但與其劃清關係，指出自己與復辟無涉。又，張元濟於 1917 年拒捐款給孔教會、1918 年拒代售康有為的《不忍雜誌》，可見張元濟與保皇立憲派已持不同的政治立場。再者，1918 年 11 月 27 日，張元濟於家中宴請嚴復父子，擬邀立憲派鄭孝胥作陪，鄭不受邀，嚴復揣測是鄭「持高節」以尊清而不願為伍。<sup>95</sup>

調整立場的張元濟雖傾向革命，但態度卻是在開放中帶有謹慎，這種態度使張元濟招致不少批評，被質疑仍有保皇思想、對革命持觀望<sup>96</sup>，例如曾和張元濟共事編纂教科書的蔣維喬說：

是時革命聲勢，日增月盛，商務同人有遠見者，均勸菊生，應預備一套適用於革命後之教科書。菊生向來精明強幹，一切措施，罔不中肯。然聖人千慮，必有一失，彼本有保皇黨臭味，提及革命，總是搖首。遂肯定的下斷語，以為革命必不能成功，教科書不必改。<sup>97</sup>

蔣維喬以張元濟一時錯誤評估局勢而沒有即時變更僅適用帝制的教科書為由，認為這是因張元濟對清室還抱希望，故對革命成功的可能性存有猶豫。仔細辨析，這樣的評論是不完整的，因為，張元濟一時的出版方針失察，讓中華書局

<sup>94</sup>張元濟云：「民主無任再落伍，在選舉場中，勿為威脅利誘所動，至會議席上，卻以心平氣和自持，不尚黨爭，尊重對方意見，取決公論，服從多數主張，行動固可自由，必須遵奉國法，信仰各有主義，應當順應輿情。」見〈新治家格言〉，《張元濟詩文》，頁 224-225。

<sup>95</sup>此見嚴復 1918 年 11 月 27 日記，載道：「菊生請晚飯，坐有夢旦、伯訓，獨蘇堪（筆者按：即鄭孝胥）不至，想持高節，以我為污耳。」嚴復著、王杖主編《嚴復集》，第 5 冊，頁 1527。又，鄭孝胥於同日亦載：「張菊生宴嚴又陵及其子叔夏，約余作陪，辭之。」見鄭孝胥著、中國國家博物館編、勞祖德整理：《鄭孝胥日記》（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第 3 冊，頁 1756。辛亥成功後，嚴復和張元濟一樣雖不太認同暴力性的革命，但亦未眷戀清室，然嚴復後涉入籌安會被擁袁派利用，而張元濟卻是持反袁稱帝的立場。有關嚴復對中國體制的見解，尤其君憲制，詳見高大威〈嚴復對中國體制的見解〉，《嚴復的再發現》（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 年），頁 107-148。

<sup>96</sup>評論張元濟在清末還有保皇氣味的學者有蔣維喬、林熙、葉宋曼瑛等。

<sup>97</sup>蔣維喬，〈創辦初期之商務印書館與中華書局〉，收入張靜廬輯註：《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年），第 8 冊，現代丁編，下卷，頁 398。

捷足先登<sup>98</sup>，使公司蒙受了不少損失，但是，在另一出版方向的評斷，又顯示出他對革命成功的信心，據汪家熔考辨：

八月十九日武昌新軍起義，二十一日起義消息傳到上海，二十三日，張元濟通知商務印書館各部門，除掉英語和漢語讀物外，其他一切在編、在排、在印書稿全部停止進行，是對政治形勢的估計。二十七日，他和高夢旦一起，要蔣維喬、莊俞……立即收集材料，編寫出版辛亥年粵、鄂、川三省革命紀，接著又編寫革命黨小傳（均見蔣維喬日記），如果我們考慮在八月二十七日，除了武漢新軍在孤軍苦戰，還沒有第二個起義城市的話，組織編寫三省當時革命史實，同時還出版其他有關書籍，表明他已和清廷決裂。<sup>99</sup>

又，革命成功後張元濟首先做了兩件事：一是剪辮、掛旗，二是出版印有革命領袖頭像的月份牌（即月曆）。據張元濟之子樹年說：「父親請了一位剃頭師傅來家剪辮子，父親第一個剪。」<sup>100</sup>「男子留辮」是大清帝國傳統，長辮幾乎是「清朝」的代碼標記，張元濟率先剪辮無異是與清朝劃清界限的一種宣示<sup>101</sup>，此外張家也掛起象徵革命成功的白旗，表達對新局面的歡迎，而張元濟更透過商務

<sup>98</sup> 原任商務印書館《教育雜誌》主編的陸費逵，看準革命會成功，遂於辛亥年脫離公司另組「中華書局」，出版一系列中華民國的教科書與商務印書館競爭。

<sup>99</sup> 汪家熔，《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頁 142-143。

<sup>100</sup> 《我的父親張元濟》，頁 14-16。

<sup>101</sup> 早在 1900 年章太炎參加自立會舉辦「中國國會」時，因「會章中有『務合海內仁人志士共講忠君救國之實』一語，既宣言獨立，又以勤王為名，是首鼠兩端，憤極，乃當眾宣布脫離『國會』，並自剪其髮辮以示與清廷絕。」（轉引王汎森書），章氏也以「割辮」方式表達與反對滿清的決心。參見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2 年），頁 5。審查人謂：「革命前剪辮與革命成功之後剪辮，意義不盡相同。」筆者按：革命成功之前的 1910 年，當時才四歲的張元濟之子張樹年，即由母親剪下辮子，張樹年回憶道：「作為『大清臣民』的標誌，男子個個留辮子。我從小就留。大約四歲時，我向母親鬧著要剪去那小辮子，母親不許。說來好笑，我不知從何處見到人家做佛事，晚上放焰口，和尚披著袈裟，手執佛珠、念念有詞，很是好玩。我想學和尚放焰口，而和尚是沒有辮子的。我一再向母親鬧著要剪，母親拗不過我，就說：『小孩子剪辮，剃個和尚頭還可以，大人就不行，剪了要犯王法，要殺頭的。』於是母親把我的小辮子剪了下來，用一條手帕包好，放在一只竹籃裡。」（以上見《我的父親張元濟》，頁 14-15）張元濟之妻以「犯法」、「殺頭」回應兒子剪辮的嚴重後果云云，可以想見革命尚未竟功之前，剪辮是件嚴重的事情。1910 年張元濟赴歐美考察教育及出版事業之前，因出國須穿西裝之故，特地製作一髮套遮掩長辮，張樹年說：「最棘手的是辮子，穿了西裝豈可拖長辮子？又不許剪。經與福利公司研究，做了一個髮套，把辮子盤在頭上，戴上髮套，還過得去。父親特地穿了西服拍了張照。」（見《我的父親張元濟》，頁 14）。張元濟以髮套掩飾辮子，無非想避免辮子為洋人所恥笑，礙於當時不准剪辮，只能如此權宜。章太炎於 1900 年、張樹年於 1911 年、張元濟則於 1912 年剪辮，三人均剪辮，辛亥革命成功之前的剪辮，不無風險，張妻之說、張元濟戴髮套，正呼應審查人稱革命前剪辮與革命成功後剪辮，意義不同。

印書館出版印有黃興、黎元洪像的五彩月曆，以慶祝革命的勝利，另檢視他在民國建立後寫信給友人的日期註明之改變：從原本的清朝紀年改為民國紀年。由是以觀，對於革命的勝利，張元濟是抱認同態度，而對帝制已無眷念<sup>102</sup>。職是之故，看待張元濟在辛亥年前後的表現，較合理的評判應該是：在辛亥年，他確實在保清和革命之間有過掙扎，但於革命進行之際，他即有響應的動作而不排斥革命，至於革命成功後則轉而支持。

## 參、國、共之間

革命成功後，各省紛紛獨立，革命黨另籌組南京臨時政府，首度以民主投票方式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黎元洪為副總統，並組成內閣，而大勢已去的清廷，爲了挽回頹勢又再度起用罷廢三年的袁世凱，目的是想利用他的北洋軍力對付革命軍，狡詐的袁氏卻徘徊清廷與革命黨之間，以遂其個人權慾，民初的政局就在袁世凱的攪亂中，產生後面洪憲帝制、軍閥割據內戰、復辟事件以及北伐等一連串的混戰與紛爭，之後，國民黨內部爭鬥：清黨與分共、中原大戰，最後竟衍成了國民黨與共產黨的爭奪戰。其間日本逼侵，中國還花了八年時間抗日，中國可謂內憂外患無斷，張元濟就形容中國近代是「一部傷心史」<sup>103</sup>，認爲這些人禍造成了中國的無窮災難。

### 一、和平籲求

1948 年張元濟已是八十二歲的垂暮老人，他在出席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議開幕式中發表了演說，「中央研究院」是國家最高的學術研究機構，身爲首屆院士的張元濟卻在這個公開場合發出了沉痛的和平呼籲：

內戰，這不是外禦其侮，竟是兄弟鬩於牆，我以為這戰爭實在是可以不必的，根本上說來都是想把國家好好的改造，替人民謀些福利，但是看法不同，取徑不同，都是一家的人，有什麼不可以坐下來商量的，但是戰端一開，完全意氣用事，非拼個你死我活不可，這是多麼痛心的事情。……，倘若再打下去，別的不用說，我恐怕這個中央研究院也就免不了要關門。……，我們要保全我們的國家，要和平；我們要

<sup>102</sup> 張元濟曾捐款革命黨人聲討稱帝的袁世凱。

<sup>103</sup> 〈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開幕式上致詞〉，《張元濟詩文》，頁 227。

復興我們的民族，要和平；我們為國家為民族要研究種種的學術，更要和平。<sup>104</sup>

爲了爭生存、爭自主，中國人砲口朝外；可是「內戰」卻是將災難施諸於國人自己，造成民不聊生四海困窮的局面，戰爭摧毀了文化與研究，也讓中國一再陷入烽火歲月。「內戰」有無開打的必要？張元濟認爲根本沒有必要，因爲「都是一家的人」<sup>105</sup>，而目的亦是爲了改造國家，既然同屬「生命共同體」之一部分，彼此即應捐棄成見地進行「協商」<sup>106</sup>，替人民創造最大利益。張元濟以「人民」爲最高考量的呼籲、以溫和方式解決爭端的主張<sup>107</sup>，這是他政治思維中一個很突出的堅持。

要強調的是，蔣介石、何應欽等國民政府高層亦列席該會<sup>108</sup>，想當然耳，張元濟此番愷切陳詞有其用意：希望引起相關人士正視這個嚴重的問題。此外，張元濟也期盼在座院士發揮知識分子之責任感，他說：

元濟幼年讀過的書記得春秋左傳有個向戌，孟子上有個宋棼，這兩位和平使者有很大的志願，流傳了很高尚的道德，元濟有無窮的期望，寄託在今天在座的諸位學術大家。<sup>109</sup>

知識分子的角色與功能，中外歷來的規範大致不差，如金耀基說：「知識分子是社會時代的眼睛與代言人。」<sup>110</sup>喬姆斯基（N. Chomsky）亦說：「知識分子的責任是說出真理，暴露謊言。」<sup>111</sup>張元濟公開呼籲和平、撻伐內戰互殘的舉措，不僅爲知識分子的批判性格做了註腳，同時也激起了漣漪而與其他有志者串連成一股和平浪潮，如王芸生指其言「正是人間正氣、人民心聲」<sup>112</sup>，而費孝通則發表〈讀張菊生先生芻蕘之言〉呼應之：

<sup>104</sup> 同前註，頁 227-228。

<sup>105</sup> 同前註，頁 227。

<sup>106</sup> 張元濟〈和陳叔通出國紀事俚言〉七絕二十四首之九〈兩國間分歧協商解決〉：「果能講信同修睦，更好排難共解紛，談笑從容消浩劫，協商兩字是真言。」《張元濟詩文》，頁 63。

<sup>107</sup> 例如國民黨內部分裂爆發戰爭，張元濟即有這樣的期盼：「甚望世界友邦與以嚴重之勸告，並停止勿售軍火，一面由國民督促，或可漸漸消弭戰事，組成正軌之政府。」見〈致普林頓〉，《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下冊，頁 1305。

<sup>108</sup> 蔣介石曾於中央研究院開會期間，宴請諸院士，但是張元濟卻謝絕赴宴，此即對蔣有所不滿的表示。

<sup>109</sup> 〈在國立中央研究院第一次院士會開幕式上致詞〉，《張元濟詩文》，頁 228。

<sup>110</sup> 金耀基：〈知識分子在社會上的角色〉，《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8 年），頁 68。

<sup>111</sup> 轉引自金耀基：《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頁 69。

<sup>112</sup> 《張元濟年譜》，頁 536。

這是一篇大家應當讀而不易讀到的重要文獻，因為張先生在這短短的致詞裡，說出了現在生活在水深火熱裡的人民大眾要想說的話；同時也以他學術先進，年高德劭的資格，對我們這些廁身文化界的後進發出他衷心的警告和期待。他警告我們：學術不能在戰火遍地中存在象牙之塔裡。警告我們：不應當做埋頭在沙土裡的駝鳥，不看看血淋淋的現實。……他對我們有期待、有號召，就是效法向戌和宋慳做時代的和平使者。<sup>113</sup>

張的正義之聲獲得了迴響，文化界人士聲援他，而傳播媒體也大幅報導此事<sup>114</sup>，不過，張元濟認為外界傳播與其原意未盡符合，遂「追憶所言，印成小冊」<sup>115</sup>，並請薩本棟轉分送中央研究院院士，如此一來，書面的流通，更加乘了他的呼籲效果。

宣說和平理念，張元濟表達出對時局的關心，但在落實方面，其仍如從前之謹慎，比方他不欲列名「自救救國會」發起人，以身體年邁、不參與公共事務為由給予婉拒，然而此一婉拒動作卻被有心人抹黑攻詰成「滿清遺老張元濟」、「預備創造奇蹟，在蘇維埃朝代中再顯身手」<sup>116</sup>。自救救國會由杜月笙等發起，旨在「團結愛國人士，發揚人民力量，保障社會安全，督促政治與社會革新，展開全國同胞自救救國反侵略運動」<sup>117</sup>，這些訴求基本上與張元濟素來所倡者相合，按理彼此目標接近，張元濟應無辭卻之由而拒絕，無怪乎遭人質疑其愛國救國的誠意。不過，須加以釐清的是，指控張元濟仍以滿清遺老自居而不思救國，這是有失公允，何以其婉拒列名？除他所言健康主因外，深入析之，應另有二因：一、該會未經張元濟同意而擅自盜名，此行為既不光明亦不尊重當事人；二、張元濟一向以謹慎態度看待黨派會社，而該會人士複雜，例如他對杜月笙的評價就不高<sup>118</sup>，當然其不欲涉足之。是故，拒絕擔任該會發起人，應是張元濟個人單純意願因素，無關陰險的權謀。

<sup>113</sup> 此文寫於 1948 年 10 月 25 日，載於《中國建設》雜誌，收入費孝通《費孝通人物隨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 年），頁 53-62。按：《張元濟年譜》亦節錄是文（頁 537），唯該年譜所引費文有幾處錯漏。

<sup>114</sup> 如美聯社即以「內戰破壞文化，張元濟痛責陳詞」為題加以報導。參見《張元濟年譜》，頁 536。

<sup>115</sup> 《張元濟年譜》，頁 536。按：小冊即指〈蜀蕘之言〉。

<sup>116</sup> 《張元濟年譜》，頁 538。

<sup>117</sup> 同前註。

<sup>118</sup> 張元濟評杜：「此君聲名不佳，且其門徒甚多。」見《張元濟日記》（河北教育本），下卷，頁 1255。



## 二、與國民黨的關係

國民黨是在同盟會合併其他小政黨的基礎上，於民國元年正式成立，歷經兩度改組：1914年中華革命黨與1919年中國國民黨，張元濟與國民黨之間有著「若即若離」的關係，張元濟對國民黨的觀感，正可反映當時國民黨與人民互動之另一側面。

### （一）拒印《孫文學說》

孫中山於1920年發表〈致海內外國民黨同志函〉說：

我國印刷機關，惟商務印書館號稱宏大，而其在營業上有壟斷性質，固無論矣。且為保皇黨之餘孽所把持，故其所出一切書籍，均帶保皇黨氣味，而又陳腐不堪讀；不特此也，又且壓抑新出版物，凡屬吾黨印刷之件，及外界與新思想有關之著作，彼皆拒不代印，即如《孫文學說》一書，曾經其拒絕，不得已自行印刷。當此新文化倡導正盛之時，乃受該書館所抑阻，四望全國，則無他處大印刷機關，以致吾黨近日有絕大計劃之著作，並各同志最有價值之撰述，皆不能盡行出版。<sup>119</sup>

孫中山以商務印書館拒印其《孫文學說》為由，抨擊該單位為「保皇黨之餘孽所把持」，孫雖無直接指明何人為保皇餘孽，但顯然矛頭是對準商務印書館的主事者張元濟。

革命成功後，中國真的陷入了張元濟當初所擔心推倒滿清後之後果——爭奪領導中心，形成軍閥割據的局面<sup>120</sup>，時遭南北軍閥排擠的孫中山，要求商務印書館出版《孫文學說》<sup>121</sup>，處於軍閥恣睢的狀況下，在「印」與「不印」之間，張元濟為保全商務印書館的中立地位而選擇不擬印，做出這個決定張元濟是有過掙

<sup>119</sup> 孫中山著，黃季陸主編，《總理全集》（成都：近芬書屋，1944年），頁160-161。

<sup>120</sup> 近人治近代史者，如李澤厚、劉再復等人開始從改革與革命對中國近代的影響，思考「改良」與「革命」的優劣，因為革命「要重新建立一種統一的公認權威、中心、體制、觀念以及『名號』，是非常不容易的。」（《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頁374）事實也證明，推倒滿清後，中國即陷入長期的不安定，是故，當初張元濟溫和改良主張如果能獲成功，也許中國就能避免混亂悲劇一再重演。

<sup>121</sup> 《孫文學說》初版最後由哪個出版機構出版？據鄒振環考證，應為亞東圖書館。參看鄒振環〈《孫文學說》在滬初版發行的前前後後〉，《史林》總第15期（1989年），頁52-56。

扎的，他說：「政府橫暴，言論出版太不自由，敝處難與抗，只可從緩。」<sup>122</sup>又：「實因官吏專制太甚，商人不敢與抗，並非反對孫君。」<sup>123</sup>可知張元濟之兩難處境，他爲了這件拒印事，曾另函孫中山致意。據此，在看待孫中山批評張元濟保皇、壟斷的同時，我們宜帶同情式地理解這件事<sup>124</sup>，而另一方面，也不能排除孫中山因個人不悅而發過度情緒言詞的可能性，畢竟該書倡導知難行易的新觀念是其精心發明卻遭商務印書館之拒印，其憤恨心情不難索解，而且果真張元濟如孫所言保皇、反革命，那麼在此之前張元濟與他密切的互動，又該怎樣解釋呢？例如 1916 年 1 月中華革命黨成員鈕永建奉孫中山之命，爲籌款討袁經費向張元濟借貸，張元濟即以個人名義向公司借支五千元資助革命黨，而同年 7 月孫中山偕同革命黨人廖仲愷、胡漢民、唐紹儀等人參觀商務印書館，張元濟出面接待；又，1917 年 2 月孫中山派鄭家彥前往商務印書館商印一萬部《會議通則》（即《民權初步》），兩星期後張、孫兩人更同席聚餐<sup>125</sup>。總括以論，張元濟若依舊心向保皇、反對革命，那麼就應該不會有黨人捐款、印會議手冊、與革命黨人往來等接觸。

## （二）國民黨的內鬥

辛亥革命成功軍閥橫行，然而北伐完成後，國民黨矛盾衝突卻陸續於 1929 年至 1931 年爆發，包括寧漢分裂、中原大戰、國共分合等，均與國民黨的核心人物蔣介石有關。

1927 年寧漢正式分裂，蔣介石與國民黨內的共產分子走向分途，其間，張元濟曾鼓勵蔡元培爲民眾著想居中進行協調工作，冀望雙方勿啓戰端，1929 年張元濟致函蔡元培說：

國勢頹敝至此，民生困苦至此，而在位者猶欲從事戰爭，試問天良，何以對國？何以對民？吾兄此時亟宜發表正論痛斥兩邊之非，布告國民速謀制止之策，並即日辭職，庶無負監察二字之責。而若輩知所忌憚，或能懸崖勒馬，亦未可知。<sup>126</sup>

<sup>122</sup> 《張元濟日記》，下冊，頁 567。

<sup>123</sup> 同前註，頁 651。

<sup>124</sup> 葉宋曼瑛也認爲孫之批評出於私人恩怨，見《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頁 169。

<sup>125</sup> 以上張元濟與國民黨人之互動，見《張元濟年譜》，頁 123、127、135、136。

<sup>126</sup> 〈致蔡元培〉，《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下冊，頁 1258。

國民黨內部的角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0年前後蔣介石分別與反蔣派桂系李宗仁以及北方馮玉祥、閻錫山等起摩擦，並全面爆發中原大戰，是役「雙方動員一百四十餘萬人，為時八個月，傷亡二十五萬人」<sup>127</sup>，人民生命財產受到無以估算的損失。向來有著民胞物與、悲天憫人情懷的張元濟，看到民不聊生的慘狀，對於蔣介石領導的國民政府之武力相向，深表不滿，1930年4月16日張元濟即寫信給胡適，表示：

現在一班屠狗賣繒的和那鄉下老太婆……都上了台，要將那二千年前的故事扮演一回，而且人人都要想做孔子，誅誅少正卯。恐怕革命成功之後，統一的專制局面又回來了，學術思想的自由仍舊無望，這便怎好？<sup>128</sup>

張元濟這番憂慮與指責是其來有自的，因為蔣介石宣佈了一系列箝制思想、束縛自由、一黨專政的政策，1927年6月蔣介石通電全國：「吾人欲求中國之不亡，惟有以三民主義為中心統一國民之思想」<sup>129</sup>，一個月後，蔣又宣稱：「我們必須以黨治國」、「無論工人、農民、商人、學生，都要遵守公認的紀律，不能隨便自由」、「以後各社會、各團體，一定要養成黨化、軍隊化」<sup>130</sup>。這些壓迫性的強制規定，對於經過辛亥革命一點一滴所累積的民主努力無疑是一大打擊，既不尊重人權亦破壞法制，尤其「以黨治國」的方式，張元濟更憂心地說：「近人好以黨國並稱，弟竊恐二字不能並存，且恐並亡。」蔣之專制獨裁不只張元濟對其有所批判，連胡適亦大加撻伐之<sup>131</sup>。

<sup>127</sup> 《近代中國史綱》，下冊，頁689。

<sup>128</sup> 〈致胡適〉，《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頁828。按：《張元濟書札》初版（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年）收入此信，然而字句有顛倒錯置，增訂本重錄改正之，今亦引初版本如下以為參照：「現在一班屠狗賣繒的和那鄉下老太婆……都上了台，而且人人都要想做孔子誅少正卯，又要將那二千年前的故事扮演一回，恐怕革命成功之後，統一專制局面又要回來了，學術思想的自由仍舊無望，這怎麼好？」見《張元濟書札》（初版本），頁163。

<sup>129</sup> 蔣介石，〈通電勗勉國人以三民主義為中心思想〉，收入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84年），第36卷，頁439。

<sup>130</sup> 蔣介石，〈中國建設之途徑〉，《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第10卷，頁453。

<sup>131</sup> 胡適在《新月》雜誌發表了一系列批評國民黨政府迫害人權、箝制言論思想自由的反獨裁文章，如：〈人權與約法〉、〈我們什麼時候才可有憲法〉、〈告壓迫言論自由者〉等，結果國民黨反應激烈，令飭教育部懲處胡適擬撤其中國公學校長職務，並停刊《新月》，且於報章攻詰胡適。為此，張元濟兩度致函胡適要他不予理會以保尊嚴。張元濟說：「鄙見竊願我兄置之不答，正所以保我尊嚴也。猶憶數年前美國某邦不許學校教師講授達爾文學說，世界認為奇談。以彼例此，均聽其留作學術史之資料，供後之評議可耳。」；「世人多無是非皂白之分，此等胡言最好置諸不理。」見〈致胡適〉，《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頁826-827、829。

國民黨從早期革命黨人的前進思想到國民政府時代的退後僵化，張元濟與國民黨的互動也自不排斥到與之保持距離，張元濟對國民黨感到失望與憂憤，他向羅家倫說：

第長此擾擾，正不知何日復見太平，來書謂難哉其為中華民國之民。弟請更轉一語：難哉其為中華民國之國。想先生聞之亦同此感慨也。

132

又云：

國體改易已二十年，即國民黨奠都金陵亦已四載，而今日現狀乃至於是，未來之黃金世界不知在何時？而當前之地獄，則國民實已不堪慘苦矣。<sup>133</sup>

身為中華民國的國民，以「悲慘」兩字來形容所處的境遇似嫌不為過，因為，除了要面對國內不斷的紛爭，同時亦須抵抗日軍的逼侵，羅家倫就曾發出「難哉其為中華民國之民」的哀嘆<sup>134</sup>！

1931 年至 1932 年間，日本接連製造「九一八」以及「一二八」事變，商務印書館與東方圖書館遭到日軍轟炸，廠房與書本付之一炬，此際，在商務印書館已投注將近三十個年頭的張元濟，目睹心血結晶瞬間化為灰燼，更是悲從中來，內憂外患接踵而至，人民生活於痛苦深淵，張元濟忍不住說：「所最望者，主持國事、皈依三民主義之人，真能致民於生，而不再致民於死。」<sup>135</sup>對國民黨，張元濟是否還有期待？在寫給丁文江的信中說道：「吾輩決不欲與國民爭權，亦不欲推翻其天下，但不能不責其必須改過。」<sup>136</sup>期盼國民黨能自我改善而非走上被推倒重來的路子乃張元濟之基底想法，此正與胡適觀點不謀而合，胡適在〈我們對於政治的主張〉文章裡也說：「我們不想組織政黨，不想取什麼政黨而代之。故對現在已得中國政治權的國民黨員，我們只有善意的期望和善意的批評」、「批評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sup>137</sup>。所謂危機，代表著危險與機會，中國面臨的問

<sup>132</sup> 〈致羅家倫〉，《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頁 771。

<sup>133</sup> 同前註，頁 774。

<sup>134</sup> 同前註，頁 771。

<sup>135</sup> 〈致胡適〉，《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中冊，頁 830。

<sup>136</sup> 〈致丁文江〉，《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上冊，頁 3。按：《張元濟全集》本，所收致丁函，多一「政」字，為：「吾輩決不欲與國民爭政權」（《張元濟全集》，第 1 卷，頁 6）；《張元濟年譜》本，則多「黨」及「政」兩字，為：「吾輩決不欲與國民黨爭政權」（頁 364），茲列為備參。

<sup>137</sup> 耿雲志，《胡適研究論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頁 230。

題如獲徹底解決，未來仍可期待，因此，像張、胡兩人，一位是舊學翰林，一位是五四運動健將，他們雖各為新、舊兩代的知識分子，但對中國的前途卻有共同願望並且引國家興亡為己任，胡適發出尖銳批判，而張元濟也不客氣地直指問題本心，他說：

以言軍政則全國養兵有八十師，只為人人擁以自衛，既不能守土，又不能剿匪，不知有何用處；以言財政，內債發至十餘萬萬，苛稅不知凡幾，真所謂民窮財盡；以言民政，則群盜如毛，江南浙西素稱樂土，近來全村全鎮洗劫之事，層見迭出，官吏竊賊逃走，政府無如之何；以言實業，則招商局長興煤礦均為商辦，公司均被奪為官有，頻年改革，招商只見今日壞某船，明日沉某艦。日煤傾銷於上海，而絕不聞有長興之煤。上海絲廠，停閉者數十家，杭州之某某機織公司，首先改良，素稱盛旺，近亦以倒閉聞。上海之國民製糖公司工廠機器，均已完全任其關閉，絕不聞有扶植之舉；以言交通，則路線未見展拓，而已成之路，時時為軍人占用，而土產擁滯無從運輸，郵政局任意增加薪俸，去年虧耗至五六百萬；以言教育，則學校只聞停課游行演講，恃眾要挾，毆擊師長，甚至開設法庭，焚毀鐵路，無賴之舉動，反甚於不識字者之所為，如此現象，成何國家？<sup>138</sup>

他不厭其煩地細數國民政府統治下的諸種措施，不單如此，依他所見，原本應該抵禦倭患、保護人民之國民黨軍隊，卻無紀律地擾民、破壞農村、強佔民房<sup>139</sup>、勒取軍餉，造成了閭閻大眾的苦惱和恐慌，許多飢民迫不得已鋌而走險，張元濟及其內侄許寶驊便曾分別於 1927 年與 1937 年被盜匪挾持「綁架」<sup>140</sup>。

儘管張元濟對蔣介石的黨治強權作為有不同的見解，但在若干事情的處理上，蔣又顯出武人秉政的爽快，例如：1933 年張元濟透過俞大維關係，在廬山曾與蔣介石面晤，希望他能調查國民黨不當干預《生活周刊》事件<sup>141</sup>；1936 年 2 月張元濟又請其協助解決浙江海鹽縣長強制拆毀民房建築公路事，這些事情，蔣

<sup>138</sup> 〈致丁文江〉，《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上冊，頁 3-4。

<sup>139</sup> 國民黨軍隊要撤離前，1949 年還曾企圖強佔合眾圖書館，因張元濟出面交涉，使該館得以倖存。

<sup>140</sup> 在張元濟遭綁獲釋後，寫信給丁文江即云：「若輩（筆者按：盜匪）……自言此等可恥之事，即父母妻子之前亦不敢言，苟有生路誰肯為此。嗚呼！誰實為之，而令其至於此哉？人言此是綠林客，我當饑民一例看。」（〈致丁文江〉，《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上冊，頁 3）又張元濟〈談綁票有感〉一文中寫道：「人民飢寒到要死，鋌而走險，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卻也可憐。」見《張元濟詩文》，頁 219-220。

介石均允諾調查之。對此，張亦致函以示謝意：「前呈芻蕘之言，仰荷批答，轉行浙省飭查，不勝感幸」<sup>142</sup>，並且隨該信附贈《百衲本二十四史》以及《中華民族的人格》<sup>143</sup>。《中華民族的人格》是張元濟所編著的一本愛國書籍，在日本侵略之際，著成此書之用意即在喚醒民眾、復興國家。張元濟贈與書冊之舉，實亦隱含了冀望蔣介石能積極攘外的深意。在「抗日」的議題上，張、蔣有了交集，不僅國民黨有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的呼籲，即共產黨也發表共赴國難的宣言，在舉國同仇敵愾之氛圍中，中國展開了長達八年的保衛戰。漫長的抗日戰爭，中國獲得了勝利，未幾，國、共之間卻再起爭端，戰後的中國元氣未復原，內戰又起，結果共產黨解放軍解放了大陸，蔣介石撤退臺灣，形成大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及臺灣的中華民國之兩岸分立局面。對此，張元濟有何看法？從他寫給蔣介石的一封信中，即可看出端倪：

廬山把晤，快領教言。光陰迅速，忽忽已二十餘年矣。此二十餘年中，公所施為受國人之嬉笑怒罵者，可謂無所不至。然弟終不願以常人待公。今者據有台澎，指揮四方，此固足以自豪。雖然，弟竊有更進於此者，今願為公言之。公浙人也，弟亦浙中之一老民。千百年來，我浙江有一不可磨滅之人物。伊何人歟？則錢武肅。是錢之事蹟，度公亦必耳熟能詳。當北宋之世，武肅據有全浙八都，軍威著於一時，能默察時勢，首先效順，而炎宗統治之局，因以底定。當今之世，足以繼錢武肅而起者，舍公而外，無第二人，竊於公有厚望焉。<sup>144</sup>

<sup>141</sup> 按：《生活周刊》對國民黨政府多所批評，1933年12月被查封。此次晤面，雙方還談論公路建築與小學生用注音字母事，張元濟反對「毫無知識、不顧民力」的建築公路。參見《張元濟年譜》，頁385。

<sup>142</sup> 〈致蔣中正〉，《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下冊，頁1043。

<sup>143</sup> 蔣介石在收到張元濟贈書後，1937年7月4日亦回覆張元濟表示謝意。參見蔣介石〈致張元濟〉，《張元濟蔡元培來往書信集》所附其他友人致張元濟函（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年），頁242。

<sup>144</sup> 〈致蔣中正〉，《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下冊，頁1043-1044。按：《張元濟書札》初版收錄此信，年份署為1957年6月15日，而後出之《我的父親張元濟》以及《書札》增訂本所錄信件之年月則均更正為1956年6月15日（《年譜》則繫此信於1956年5月條）。張元濟函勸蔣介石歸順事，有以下幾點疑問：一、張樹年說1955年初春其父提出欲寫信給蔣的想法，並於提議後未久（「隔數日」）即寫成此封歸順信，據此，此信當於1955年初春完成，然而張樹年於文中所附其父之信件寫作時間卻繫於1956年6月15日，未知何以有如此的撰成時間之落差？二、歸順信內容提到「當北宋之世，武肅據有全浙八都，軍威著於一時，能默察時勢，首先效順，而炎宗統治之局，因以底定」，此說不符史實，據史籍《五代史》、《吳越備史》、《錢氏家乘》等載，錢武肅即五代十國之一吳越國的開創者錢鏐，其生於唐宣宗大中六年（852），歿於後唐明宗長興三年（932），其死時北宋尚未建立，趙匡胤發動陳橋驛兵變，於西元960年才取得政權改朝，故錢鏐並未有獻土歸順之舉，真正納土歸宋的是錢鏐之孫「錢俶」，其於太宗太平興國三年（978）歸順宋朝（有關錢鏐、錢俶之生平事蹟可另參倪士毅《浙江古代史》與錢濟鄂《吳越國武肅王紀事》）。張元濟博學多聞，精於版本校

張元濟在人生最後階段以同為浙籍鄉親身分寫了這封信，對蔣介石喊話，希望其能以維持中國完整作考量，效法吳越國王錢武肅（按：應為錢俶）精神將臺澎地區回歸中國，此一勸歸順書蘊含了什麼意義？據張元濟友人陳叔通先後於1956年6月4日、6月7日、6月14日致函云：

- ◎尊撰歸順書想已郵發，或交管君代發亦可矣。萬一有助於和平解放。甚盼以原稿寄示。高年而又是半臂，能為此，足為愛國楷模。
- ◎勸歸順書可以交統戰部寄香港轉遞，屬為秘密。昨日因在毛主席座談席上亦即提到，云千萬代為致念。
- ◎歸順書可能激發天良，以交滬統戰部代為轉港郵遞為要。仍盼將腹稿由仲木將大致寫出寄示。<sup>145</sup>

從陳函內容以推及張元濟所書寫的勸降文件，可以標示幾點意義：一、當時陳叔通已為共產黨官員，陳屢次致函催促張元濟速寄此歸順書，目的無非希望藉張元濟之盛名以及與蔣的鄉親之誼，對蔣進行統戰勸說。二、毛澤東叮囑陳叔通向張元濟轉達致意，顯見毛澤東對此件勸歸順書之看重，進一步解讀，此正是中共高層急切統一中國之表現。至於張元濟本人的態度又是如何呢？依張元濟一向之和平主張以及歸順書內容論之，他心中始終是存有完整中國之圖像，而且他期待以和平方式解決分裂問題，扼要言之，他贊成統一，且盼望能在有生之年親睹中國的真正和平。<sup>146</sup>

---

勘，且又嫻熟家鄉之事，何以會錯引史實？究竟張元濟弄錯史實乃因老病、記憶衰退而淆混，抑或另有隱情？有待深考，此題辨析另詳劉怡伶：〈有關張元濟的若干問題考辨〉。又按：王英〈一張照片引出的佳話〉指此信「後由廣播電臺對臺灣播出」，王文載於1996年11月6日《中華讀書報》，收入《商務印書館一百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年），頁83。

<sup>145</sup> 以上所引均見《張元濟年譜》，頁579。

<sup>146</sup> 審查人謂歸順書一事不宜簡單地視為張元濟之本意，1956年時中共正在大力改造知識分子之時，應較仔細地分析當時的局勢與張元濟之處境。審查人所言有理，筆者查諸相關文獻，據中共官員陳叔通（敬第）短時間內之多封信函（1956年6月4日、6月7日、6月14日），以其催促張元濟交遞歸順書給統戰部的舉措觀之，此份勸降文件之撰寫是否出自張元濟本意，不無疑慮，且張元濟在此之前已領受當局的生活挹注「華東行政委員會月給我二百餘萬」（《張元濟全集》，第2卷，頁431）；張元濟請求當局為其延介醫師診療眼疾「今有眼疾，無處延醫，只有請介紹一眼科良醫蒞臨療治」、「弟患目疾蒙代延華東醫院王漢美醫師蒞臨診視，並給藥品，連日敷治所患均已減輕」、「弟前患目疾，蒙介紹華東醫院王漢美醫師蒞臨診斷，並給藥水、藥膏，敷治見效」（1954年3月26日、4月1日、4月2日致管易文三函，見〈張元濟晚年軼札七通〉，《檔案與史學》1996年10月第5期）；而對當局的施政，張元濟也多表支持，例如認購政府所發行的建設公債——「近見友人輩紛紛認購，弟亦擬稍盡棉力」（1954年2月22日致管易文函，〈張元濟晚年軼札七通〉）、「今已填具呈上，共認購壹百萬元，分期扣抵手續太為煩碎，故請於三月分（份）工資內全數扣除」（1954年2月23日致管易文函，見〈張元濟晚年軼札七通〉）、捐獻廬山兩棟平房私產給公家使用（1954

張元濟一生爲了中國自強團結與和平做出努力，即使行將就木之際，他心裡還是懸掛「和平統一」這件事，而仔細檢視他在各個階段的所言、所行，其「和平使者」的形象十分鮮明，唯他希望找回那一塊脫落的地圖以拼湊完整面貌的最終願望，在他逝世後將近半個世紀的今天仍無由實現。

### （三）與共產黨的關係

國民黨撤退臺灣，中華人民共和國在大陸正式登場，1949 年 6 月張元濟出席中研院二十一周年紀念大會，繼 1948 年公開呼籲和平後，張元濟再度上臺發表演說：

中研院去年在京開會，兄弟發出狂言，反對戡亂，爭取和平，朋友們說有人要跟我戴紅帽子，但我不在乎，我完全是本著良心說話。今年他們打不下去了，又要備戰言和。3 月 8 日交大校慶會中（筆者按：交大五十三周年紀念會），元濟痛斥備戰言和，這當然不能動湯恩伯和陳大慶等的視聽。以後所謂大上海保衛戰開始了，毀了不少地方，離散了不少家庭，人民被保衛得受不住了，解放軍解放上海後，接管情形很好，這是人民之福，相信人民政府為人民服務毫無問題。<sup>147</sup>

---

年 5 月 25 日致管易文函，見〈張元濟晚年軼札七通〉），由以上的互動顯示，張元濟晚年仍與當局保持良好的關係，中共對他甚為禮遇。若基於人情之常而撰歸順書，似亦不無可能。據 1952 年 4 月 7 日、1953 年 4 月 28 日、1953 年 5 月 7 日、1955 年 12 月 12 日張元濟回覆陳叔通的四封信：「（筆者按：陳叔通）又言原有軍隊均已移至福建，豈有征台之意乎？韓戰既息，我國不復用兵，渴望和平，亦可以昭示於世界。台灣終為我囊中之物，不妨徐由政治解決。若此時用兵，勝敗尚有難言，未知卓見以為何如？」（《張元濟全集》，第 2 卷，頁 422）、「弟總希望不再用兵，台灣不許侵略，南越許其自由，苟能如是，即真所謂為忍耐，總可暫為和平，世界人心無不大快。兄能為當局一言否？」（《張元濟全集》，第 2 卷，頁 431）、「弟前信謂台灣不許侵略，南越必許其自由，其他皆不妨退讓。果能辦到，外則可表示我之切願和平，內則可以促進我之五年計劃。未知兄意以為何如？」（《張元濟全集》，第 2 卷，頁 431）、「美蔣安全條約實為我國之恥。弟初見之，直欲捶破繩床。繼思家有不肖子弟，奚責人為，天道賞善罰惡，如此天胡不降之罰，而任其禍我邦家，毒我人民乎。」（《張元濟全集》，第 2 卷，頁 438）此四函，或能稍解張元濟撰寫歸順書之意，蓋張元濟諸信屢屢申明「和平」之望，衡酌彼時國際氛圍，停止韓戰的輿論高漲，和平有望，張元濟認為值此人心思和之際，勿再升高兩岸對立情勢，而建議當局勿以武力對臺灣，而應採政治協商方式徐緩解決，但自 1955 年美蔣共同防禦條約簽訂之後，臺灣與美國關係緊密，無疑加深了「統一」的困難，也間接打斷了張元濟一生追求完整中國的夢想。因此，若從張元濟本於國家完整、和平信仰以及反對美帝侵略的想法去看待 1956 年歸順書一事，此固不宜逕以視為張元濟之本意，其中確實也隱含張元濟個人「和平」、「不分裂」的殷切期盼，與其民族意識有關。

<sup>147</sup> 《張元濟年譜》，頁 544。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的接收大員在原日軍佔領區進行收復工作，然而國民黨軍隊卻任意破壞並騷擾民眾，張元濟就指出：「任意強佔民居，物價比日寇乞降之始昂貴至一、二倍。凡屬新貴，幾無不花天酒地。似此情狀，甚覺灰心。」<sup>148</sup>相較彼時的共產黨解放軍，國民黨之恣意放縱與不當用人<sup>149</sup>，對此，張元濟甚感氣憤，尤有甚者，1946年起張元濟也迫於現實環境不得不靠賣字維生，可以想見當時社會生存之不易。張元濟大半輩子都在國家風風雨雨中渡過，他衷心期盼當政者能帶人民脫離苦海的心願，從早年到晚年仍舊不得一償宿願，他的民族情感彷彿受到了嘲弄與傷害，抗戰勝利的喜悅不多時即被漸趨腐朽的國民黨所沖淡，張元濟下一個希望該寄託在哪裡呢？他說：

現在有許多人對共產黨不滿意。是的，共產黨並非沒有錯處，但是現在除了共產黨還有誰呢？還有誰能負起這一艱巨的責任呢？我們總應該希望國事一天一天的好轉，多說些話是無益的，我們唯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埋頭苦幹，奮發圖強。也有人說，共產黨來了，我們的生活苦了。要知道這苦是幾百年——尤其是近百年來所積累下來的苦，並不是共產黨帶來的苦。<sup>150</sup>

細味張元濟之說法，實有深意存焉，他將中國的前途轉寄託於共產黨的這番評論，似不無道理。首先，我們翻翻中國近代史，一連串的苦難一波接著一波，其間每個階段的政權幾乎都在嘗試處理中國內外的危機，然均功虧一簣，人民首當其衝，苦難無斷，是故，張元濟認為將中國長期的動亂與不安歸結到共產黨是不甚合理。其次，張元濟見證了近一百年的變遷，其以歷史發展的宏觀角度看待中國人的悲慘，一則他因參與了歷史上若干重要時刻的活動而深有所感，二則他衷心盼望共產黨是唯一也是最後一個能終結長期苦難的政權。

張元濟清楚知道共產黨並非沒有缺點，但比起國民黨，共產黨表現出來的格局就顯得寬闊多了——至少「它」願意傾聽人民聲音、對外患採更堅定的抵抗立場，不管這是出於拉攏人民還是真心變革，共產黨善意舉動的確讓張元濟深以為有望，因此，有瑕疵但願與人民站在同一線的共產黨，張元濟無太多苛責反而積極鼓勵與建言。張元濟以「為人民利益而建言」的模式，並沒有隨個人對黨派好惡而有所改變，無論是對清廷、國民黨抑或共產黨，張元濟在面對各階段不同政權時均克盡智囊獻策的角色。

<sup>148</sup> 〈致王雲五〉，《張元濟書札》增訂本，頁211。

<sup>149</sup> 例如國民政府非但未嚴懲漢奸反而重用（如周佛海之類），此在深惡漢奸的張元濟看來，這無疑又是「致民於死」。

<sup>150</sup> 《張元濟年譜》，頁552-553。

共產黨強調民族主義，以愛國者的姿態擄獲中國人的認同，對內而言，在抗日階段其可以和國民黨攜手對日，而從國民黨手中取得政權後，又將政權延伸到邊垂的疆域西藏、蒙古、新疆地區，將中國各民族緊密聯繫在一起，並實施縮小貧富差距的工、農運動；對外而言，立下快速追趕歐美先進國家的弘願，這些均使熱愛民族的張元濟傾心，因此他公開支持共產黨進行改革的動作也就不難理解了，無怪乎他說：

解放並非換朝代，這是幾千年來的大變。……我們全國人民還得忍苦忍勞，咬緊牙關，渡過這一非常時期，建設起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sup>151</sup>

在張元濟的認知裡，解放並不是打倒重來，他覺得解放對於人民反是另一個新生的開始、是另一股改革的力量，張元濟深信只要人民能與新的改革勢力配合，那麼「新中國」的美好未來是指日可待的。

藉由張元濟與共產黨領導人的互動關係，我們也可以理出其生命最後十年「熱愛民族」之心路歷程。張元濟年紀比毛澤東長二十六歲，張、毛倆在「愛國」、「民族意識」的理念上取得了共鳴，而張元濟與共產黨的關係突出地表現在與其領導人毛澤東之相知相惜上。1949年張元濟獲邀擔任第一屆政治協商會議代表，其原本以諸種理由加以拒絕，如：「腦力衰退，健忘」、「會中故交不及十人，氣類太孤」、「素性憨直，不喜人云亦云，若緘默不言，實蹈知者失人之咎，若任情吐露，又招交淺言深之譏」、「年力衰邁，方染微恙」云云<sup>152</sup>，不過，終究他還是答應列席擔任政協代表，最關鍵的原因當是顧及毛澤東，因為張元濟後來得悉代表乃由毛澤東親自選定才允諾出席。是知，張對毛之印象應為不差，在黨中央三催四請仍不欲前往的情形之下，最後因毛澤東緣故他才願意成行，更可見毛澤東之於張元濟心中份量不輕。

張元濟北上參加政協會期間，有幾項值得注意之事：

一、提出重人權與保全中國領土之意見。張元濟在《共同綱領》修正案中主張廢除不合時宜的肉刑，另增補入一條「發展海運」以及增加「保全我國領土」字樣。針對《共同綱領》第十七條有「禁止肉刑」四字，張元濟發言指出：

自漢文帝廢止後，似南北朝時曾經恢復，至何時又被廢止，不復記憶。似唐宋以來均已無之。近惟黥刑尚未廢，但非正刑。肉刑早已禁絕。際此文明進化時代，如以此列入，於我國面子甚不好看。我料此所謂

<sup>151</sup> 《張元濟年譜》，頁 553。

<sup>152</sup> 以上所引均見《張元濟年譜》，頁 546。

肉刑者，當指鞭笞而言。其實民國以來，鞭笞亦已禁止。至於私刑，則比此更甚，亦禁無從禁。鄙見事實上早已無有，何必再綴此□。<sup>153</sup>

依張元濟之意，綱領所言「肉刑」，不論是指歷來的酷刑或是鞭笞，至今都已被取消，既然此刑無存，便無須多此一舉於綱領中繼續存列「肉刑」二字，且今為文明進化時代，若不取消該字眼，則易突顯中國之野蠻，更無法掃除外界既有之對中國落後、不人道的形象成見，故張元濟力主廢除該刑。至於保全領土，張元濟則云：「不許別人侵略我，我亦只保全我之領土，並無侵略他人領土之意。」<sup>154</sup>張元濟上述建議均獲採納，其保障人權、重視人道、保全中國領土、求自主之用心頗深。

二、反對用西曆紀年。張元濟大部分的建議多獲肯定，但提出關於紀年問題的看法則未被採納，張元濟反對的理由為：

余以採用公曆，合於世界大同之義，但目前尚難達到此境。至以現在為劃時代，則民國猶是民國、民主猶是民主，不妨仍繼續稱民國紀元，今年為三十八年，且採用公曆今年為一九四九年，一則我國歷史已有四千三百餘年，似失□國性；二則公曆以耶穌降生為始，於我國回族、藏族不免有影響宗教之戟刺。<sup>155</sup>

其舉二項理由，認為不宜使用公元紀年。深入去理解他的考量，可以掌握兩個意義：其一、以耶穌教年曆為主則於回教等宗教團體有所不妥為由，顯見其公平對待不同宗教；其二、中國歷史悠久，若以公元紀年，易混淆國史，且國人漸已習慣民國紀年，辛亥革命後張元濟自己的書信與日記，就改以民國紀年註記。

三、不主張更動國名。毛澤東徵詢關於國名問題——是否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名稱底下加括弧簡稱中華民國？主張刪去與保留者都有，而張元濟是贊成刪去，他反對毛澤東之加註「中華民國」的簡稱，他認為應刪去該簡稱，我們仔細分辨箇中道理，其持刪去立場是忠於史實的，因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與「中華民國」創立背景有別，而毛澤東卻企圖以簡稱中華民國來包裹中華人民共和國，顯然有違實情。毛澤東在國名上運思，不無掠奪辛亥革命之功以與國民黨爭正統的意味。<sup>156</sup>

<sup>153</sup> 《張元濟日記》（河北教育本），下卷，頁 1222；另參《我的父親張元濟》，頁 201-202。

<sup>154</sup> 《張元濟日記》（河北教育本），下卷，頁 1241；另參《我的父親張元濟》，頁 202。

<sup>155</sup> 《張元濟日記》（河北教育本），下卷，頁 1234。

<sup>156</sup> 該議題經與會人士討論後，毛澤東卒採沈鈞儒「刪去四字，亦無忽視辛亥革命之意」的說法為結論，不更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名。見《張元濟日記》（河北教育本），下卷，頁 1237-1238；

四、兩度與毛澤東會晤。張元濟除了與周恩來、陳雲、朱德等多位共產黨官員會面外，最特殊的拜訪則是在北京會晤毛澤東兩次，時間分別為：9 月 19 日以及 10 月 11 日，這兩次都是中共方面主動邀約，並由上海市市長陳毅接送陪同<sup>157</sup>。第一次，張元濟與毛澤東同游天壇，毛澤東向張元濟詢問有關戊戌變法與受光緒召見的情形，他並肯定張元濟主持商務印書館的貢獻——「商務出書有益於民眾」<sup>158</sup>，而他更不諱言自己便從該館所出版之《科學大全》（按：即《漢譯科學大綱》）書中<sup>159</sup>，獲得很多知識與啓發。這次晤面，據隨侍在側的樹年回憶：

游罷天壇，是晚先嚴很激動，久久不能入睡，對我說，曾先後見過光緒、袁世凱、孫中山、蔣中正，一生沒有過太平盛世，內戰外患相繼不絕，看來從今起和平統一有望了。<sup>160</sup>

在與毛澤東有趟知性之游後，張元濟發出了自信太平的言詞，這與他過去和不同政權領導人接觸過後心情低潮與不安的反應，有很大的差別，張之所以如此激動，恐與其受到毛的禮遇重視以及欣慰所經營商務印書館獲得迴響不無關係，而且能與人民視為民族英雄的毛澤東同游，張元濟的喜悅不難想像。第二次，張元濟參加毛澤東中南海怡年堂寓所舉辦的餐會，有了前次愉快的交流，張和毛的距離拉近不少，從張元濟在 10 月 1 日觀畢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國大典後隨即致函支持毛澤東而迅速獲得覆信致意的相知動作來看<sup>161</sup>，張、毛兩人是互有好感，於是在這次餐會張元濟更大方地暢所欲言：

---

另參張樹年〈陪隨先嚴去平與會瑣記——先嚴參加第一屆政協會議片段回憶〉（以下簡稱〈陪隨先嚴去平與會瑣記〉），收錄《張元濟軼事專輯》，頁 18。

<sup>157</sup> 陳毅曾於 1949 年 6 月邀張元濟出席上海「耆老策杖觀太平」的集會，會中張元濟針對實業、農業、水利、交通、社福、教育等問題侃侃而談，對於新政府他充滿期待。參《張元濟年譜》，頁 545。

<sup>158</sup> 《我的父親張元濟》，頁 202。

<sup>159</sup> 張元濟於 9 月 19 日的日記裡寫道：「伊曾讀《科學大全》，得新知識不少。」（《張元濟日記》河北教育本，下卷，頁 1231）而張樹年的《我的父親張元濟》中則言：「他讀過商務出版的《科學大綱》，從中得到很多知識。」（頁 202）按：據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記載（頁 134）以及商務印書館主編《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 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頁 127），《科學大全》或《科學大綱》即指《漢譯科學大綱》（四冊），該著由王雲五等翻譯，譯自〔英〕科學家湯姆生（J.A.Thomson）的作品 *The Outline of Science*。

<sup>160</sup> 張樹年，〈陪隨先嚴去平與會瑣記〉，《張元濟軼事專輯》，頁 19-20。此行，張元濟應是非常愉悅，因為事後他還主動向陳毅索取游天壇照片作為紀念。

<sup>161</sup> 張元濟 1949 年 10 月 1 日〈致毛澤東〉：「昨日會推元首，我公榮膺之選，為吾國得人慶也。英倫三島昔以雅[鴉]片強迫售我，林文忠焚毀，乃願輒於半途，釀成辛丑條約之慘。桎梏百年，貧弱日甚，後雖設禁，終多粉飾。我公發憤為雄，力圖自強，必能繼□前賢，鏟此□毒，一雪此奇恥。謹呈上《文忠政書》全部，藉伸祝頌之忱。」（《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上冊，頁 269）張元濟此信一表祝賀，二表期勉，而贈書用意即希望毛澤東也能效林則徐查緝鴉片的精神抵禦外侮。毛澤東 5 日回函：「大示並惠書兩函均收到，謹謝厚意，敬祝興居佳勝。」

一為應令下情可以上達，當局措施容有未當，報紙不敢昌言，宜酌登來稿。報館應負職，必須有確實地址、姓名，方予錄登，以廣言路。……二為建設必須進行，最要為交通，其次農業，其次為工業。工業先輕工業，次重工業。國抗戰八年，內戰三年，民窮財盡，若百端並舉，民力實有不逮，不能不權衡緩急。……三為繳糧之事，民間苦於負擔甚重。此由有田者有匿報之戶，於是實報者意有不平。同匿報者反而減輕，此必須由地方公正紳士出面相助。……。<sup>162</sup>

這些應辦事宜都是張元濟過去力主須儘快改善的項目，而此次他則更進一步列出緩辦急辦的先後順序，顯示他對改革期盼之甚。毛澤東在前後短短十天內，連續徵詢請益張元濟，張元濟亦不吝獻策，彼此互信基礎就此奠定，張元濟駐京期間，主要收穫除了訪書、倡言理念、當選第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外，當以與毛澤東之良性互動為最大欣慰，在爾後的公開場合裡，張元濟便屢屢呼應毛主席，例如：

毛主席說，我們的情況是有困難的，但是有辦法。拿辦法去克服困難，所以我們是有希望的。我們上海，現在因戰爭沒有結束，工商業也未全部好轉，困難是很多的。克服困難的辦法是什麼呢？就是人民與政府團結起來，繼續努力負起反封鎖的六大任務。只要我們始終如一，到底不懈，前途有很大的希望，一定是可以造成一個新民主的上海，並且可以助成一個新民主的中國。<sup>163</sup>

共產黨解放軍在抗日行動上表現愛國，在接管上海時風紀嚴明，張元濟對其已留下好印象，認為這樣的新政府「是人民政府，為人民服務」、「是清明的政府，是人民所最希望的」。<sup>164</sup>此外，張元濟對毛澤東個人有信心，遂對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抱以無窮希望：「解放成功又一天」<sup>165</sup>、「及身已見太平來」<sup>166</sup>。張

見張樹年〈陪隨先嚴去平與會瑣記〉所附〈毛澤東主席給張元濟的信〉，收錄《張元濟軼事專輯》，頁 23。

<sup>162</sup> 《張元濟日記》（河北教育本），下卷，頁 1254；另參《我的父親張元濟》，頁 203。

<sup>163</sup> 這段講詞是張元濟出席 1949 年 12 月上海第二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開幕式的致詞。（見《張元濟年譜》，頁 554）按：1949 年張元濟先後以出版界代表的身分被推為第一、二屆上海各屆代表會議。另，1949 年 12 月和 1953 年 1 月則分別被任命為華東軍政、行政委員會委員，1954 年 8 月與 1959 年 3 月則當選第一、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

<sup>164</sup> 〈中央研究院二十一周紀念演詞〉，《張元濟軼事專輯》，頁 14。

<sup>165</sup> 〈告別親友詩〉七絕，《張元濟詩文》，頁 73。

<sup>166</sup> 〈自挽〉聯，《張元濟詩文》，頁 96。

元濟晚年立場左傾，他心甘情願為共產黨背書，但特別的是，張元濟支持共產黨，但他並未入籍該黨<sup>167</sup>，這種表面看似矛盾之言行落差蘊含了什麼意義呢？其實，只要回溯他過去的經歷即可明悉，這正是張元濟一貫對結黨結社的態度——參與而不真正捲涉，或不欲列名、或婉辭組會，尤其是由他人發起的組織團體，張元濟大多持審慎態度，例如 1954 年張元濟當選首屆全國人民大會代表，其撰七絕一首，曰：「人民代表昔嘗免，只限區區市井中。誰料年華近遲暮，反徼群眾倍推崇。同於同胞新負荷，無偏無黨任追蹤。劇鄰薄植凋零甚，仰偃繩床一病翁。」<sup>168</sup>起初張元濟辭卻該職，並以「無偏無黨」自許而不涉黨派，但若是自倡的團體（如健社），他便積極投入，之所以會採「自組」與「他創」的差別對待，就前者言，他清楚自己的訴求既明確又單純，且出於主觀意願從事，是「志願性結合」（voluntary association），「同類意識」（consciousness of kind）高，列名並無太大負擔；就後者言，他人所創之宗旨與成員背景無法確實掌握，貿然與列恐惹禍端，因此就形成了這種「既接觸又迴避」之作風。

對於時政觀察，張元濟可謂別具隻眼，他看出中國的苦難，依他之見，各個政權黨派雖其中摻雜若干私人權慾與角力，然其最終鵠的，事實上大都指向了同一歸趣——救亡圖存，只是彼此間信仰有異，取徑有別罷了！因此，既然皆為中國民族著想，則由誰當家主政，他便無一定的堅持，可以是君主立憲、民主共和，也可以是國、共兩黨，只要誰真正有能力、有誠意帶領人民走向和平富裕的坦途，即是寄託依靠的對象，深明此點，就可以明瞭何以張元濟從維新到革命、從國民黨到共產黨的幾次政治立場調整之思想底蘊，即是：把政權黨派放兩旁，將人民利益擺中間的「人民至上論」。

幾次立場的調整後，張元濟終於在晚年認定由共產黨所組成的政府最符合他所企盼能帶來和平統一的政體，然而，歷史則呈現這樣的事實：建國初期的共產黨，在恢復經濟與對抗外力方面，拉近了與民眾的距離，但，緊接而起的四清五反鬥爭與文化破壞，卻是人民揮之不去的夢魘。中共自 1949 年建國到 1959 年張元濟逝世這十年間，在大陸進行了批鬥知識分子的反右運動，例如毛澤東就對文藝界展開幾次的思想鬥爭，包括批判了胡適、梁漱溟、俞平伯、胡風、馬寅初等人，1957 年毛澤東號召知識分子大鳴大放，不料有些知識分子發論極其尖銳，毛澤東遂組織群眾對知識分子展開批鬥，據估計至少有五十萬人被打為右派分子，或禁止任教、或嚴禁出版、或阻礙研究、或關進牢房<sup>169</sup>。檢視目前現世的史

<sup>167</sup> 按：張元濟是否為共產黨員？筆者曾撰文考辨認為張元濟並未加入共產黨，詳參劉怡伶：〈有關張元濟的若干問題考辨〉。另外，筆者於 2006 年 7 月 29 日，在滬拜訪張人鳳先生，當面求證此問題，其云祖父並無入籍共產黨，儘管張元濟與共產黨要人有所接觸，但始終是無黨派立場，證實了我先前的判斷無誤。

<sup>168</sup> 此詩《張元濟詩文》未收，轉見柳和城〈張元濟詩、聯輯佚〉，《張元濟軼事專輯》，頁 136。

<sup>169</sup> 參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年），下冊，頁 642-677。

料文獻記載，張元濟在這段共產黨打擊知識界的恐怖歲月裡並未對中共的措施提出積極的批判，就他一向敢言、正義的風格來說，其「默不作聲」的姑息態度，是否意味著他在人生最後十年階段，對中共以及毛澤東抱以過度的理想與熱情，因此才會對中共之摧殘人民的動作，視而不見，失去了他貫有的理性？抑或為保障自己安危而噤若寒蟬、或年老體衰不涉世事？張元濟在大陸解放後十年之間未堅持他一向的敢諫風骨而對中共的舉措進行反省、為歷史留下見證，此實令人費解。以上的疑惑，筆者在張元濟孫女張瓏新出的回憶錄裡，找到了約可解釋的理由，她說 1949 年張元濟到北京參加全國政治協商會議首次代表大會及開國大典之後，同年的「歲末中風，從此開始了十年的病榻生活」、「病情嚴重，治療時間很長」、「左半邊癱瘓已經難以逆轉」，文化大革命時期張家被抄，張元濟「在退休後每年有一本日記，共有 20 來本，都被撕得粉碎」<sup>170</sup>。張瓏的文字也許可為張元濟晚年的噤聲作一些澄清：一、張元濟中風後，體力大不如前，即便有意於世事，亦恐力不從心；二、張元濟生前有撰寫日記的習慣，可惜在文革中被撕毀了，若這些日記得以留存，或能從中略窺張元濟後期思想的底蘊。

張瓏突顯日記及資料佚失、祖父老病，是否即為張元濟晚年噤聲脫罪？抑或另有隱情？張瓏說祖父張元濟初期中風，一度病重。然經治療及調養，張元濟雖字跡不復以往端正、目力漸弱、行動不便，但尚得看報、撰文，從張元濟寫給友人的數封信，略可得證，例如 1952 年 4 月 7 日在寫給陳叔通的信尾附註「此信係在病榻燈下椅枕所書，書不成字，惶悚無似」<sup>171</sup>；1954 年 3 月 26 日給管易文的信裡表示：「弟病榻無聊，不能不展閱書報，藉以消遣」<sup>172</sup>；又如 1955 年 12 月 12 日再給陳叔通的信中提到：「每日必欲看報，幾如有癮。天氣晴明，目力亦尚不弱。每喜寫字，兼思賣字，但無人要，非人不要，實我字不佳耳。明歲我兄八秩誕辰，擬寫一大壽字奉祝，聊伸寸悃，尚祈鑒納」<sup>173</sup>。張元濟 1955 年已八十九歲，六年前（1949）中風之後，依其諸信所言，應長年臥病在床，但醫治、調養得宜，故病體猶能支撐，又據孫女張瓏回憶祖父張元濟：「祖父中風，病情嚴重，治療時間很長」、「中風開始時比較嚴重，但過了幾天後好像漸有恢復。……過了兩三天後突然發生了事故，一天中午病房裡沒有人照料，祖父那時可能神智略微清醒，想自己起來，誰知竟從病床上跌到地上，昏迷不醒。我記得去醫院看他時，見他半邊臉都摔成了青紫色。從那以後病情就大大加重了，有一段時間他發高燒、神智不清。有兩次我去醫院，他見了我就抱住我的頭大哭，狂躁不安。此後父親決定將他轉到延慶路的劍橋醫院，請名醫樂文照診治。經過數月的精心治療，病情逐漸好轉。但左半邊癱瘓已經難以逆轉。在醫院住了幾個月後回家，

<sup>170</sup> 張瓏，《水流雲在：張元濟孫女的自述》，頁 43、48。

<sup>171</sup> 《張元濟全集》，第 2 卷，頁 423。

<sup>172</sup> 見〈張元濟晚年軼札七通〉。

恢復得最好的時候他可以在床上坐起來，背後用靠墊撐住，前面放一小炕桌，在桌上寫字寫信，讀書看報。天氣好的時候可以由人扶起來在藤椅裡稍坐片刻。」<sup>174</sup>張元濟能寫作、寫信、讀書、閱報，閱報正意味著張元濟仍關心時勢，又證於 1956 年 7 月 31 日給陳叔通的信，信中說：「報載埃及政府收回蘇彝士河，令人起舞，因成一絕，寫呈教正。」<sup>175</sup>此知晚年的張元濟對國內外時局仍時刻關注，並有一己之見，唯對時局的關切與批評隱於親友函札、詩文中，對於五〇年代的中共表現，張元濟顯然未曾公開表白，除日記、資料佚失，是否另有隱情？若自張元濟致友人信函間接推測，他在人生最後階段，頗苦於中共當政下的日常不便，包括醫師難覓、食物匱乏、買賣受制，他在 1953 年 10 月 22 日給上海市中共官員管易文的信裡寫道：「弟近來飲食欠健，思食糯米甜飯，以資調劑。不意派人入市購買，竟不可得。據米店人稱糯米須由政府配給，不能隨意買賣。弟備員本會，素荷關垂，不揣冒昧，擬祈代陳當局，俯念久病孱軀，酌予配給斗升，無任感荷，伏維垂鑒。」<sup>176</sup>再者，張元濟一生心繫的商務印書館，在所謂的新中國時期也面臨了須配合公私合營的政策，當局爲了拉攏張元濟，仍請其掛名已歸國有的商務印書館董事長一職，但又考量其體弱而宣稱「可不關事」、「可另派一副」<sup>177</sup>，表面尊張，實則陰削張在商務印書館的影響力，在可見的文獻中，張元濟屢向陳叔通表示他支持將商務印書館捐獻給政府，理由是：

商務印書館成立已半世紀，此數十年中所歷之險阻艱難，及弟此次疾病，危疑震撼，有賴於我兄之匡助保全者，非言詞所能盡述。至於今日雖不免支離破碎，而逋負業已清償，收支亦近平衡，尚能以整個機構貢諸政府，列入公私合營之局，實堪私幸。<sup>178</sup>

又：

總署有招邀我兄與弟商談之舉。公私合營關係方面甚多，總署慎重行事，此為應有之程序。前在報端獲讀某項報告，見有論及公司合營事者，函意甚精。略謂國家資本主義是社會主義成分和資本主義成分進行聯繫而結合。依此涵意，領導與被領導之地位甚為明確。合營云云，為我等多年之希望，今竟如願以償，故聞訊之下，全館同人無不絕對

<sup>173</sup> 《張元濟全集》，第 2 卷，頁 438。

<sup>174</sup> 《水流雲在：張元濟孫女的自述》，頁 43。

<sup>175</sup> 《張元濟全集》，第 2 卷，頁 438。

<sup>176</sup> 《張元濟全集》，第 3 卷，頁 485。

<sup>177</sup> 《張元濟全集》，第 2 卷，頁 437。

<sup>178</sup> 《張元濟全集》，第 2 卷，頁 434。



擁護。股東散處各方，或有少數未甚明晰者，本館同人自當盡力說明，以期順利進行。<sup>179</sup>

這是張元濟自由意志下的表白抑或局勢下不得不然？再以敬老崇文為由邀張元濟出任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長一事為例，根據張樹年轉述，1952年10月上海市委統戰部長周而復、中央統戰部長李維漢至張宅邀任，謂政務院擬設置文史研究館，「凡年齡在七十以上，有學問、家境清貧者，可以入館，政府在經濟上予以適當補助，使老者安度晚年。李請父親擔任館長。父親因年邁，偏癱床榻，不能勝任，顧慮重重，當時沒有同意。翌年春，上海籌建文史館，周而復致函陳叔通先生，請其轉請父親及早就任，並告係毛澤東主席提名。父親即不再推辭。」<sup>180</sup>若依文史館之設立宗旨，應與實際政治活動無涉，張元濟大可應允出任，何以推辭再三，最後以不違背毛澤東的好意而接受。中共多次延請張元濟，不無引其為政策背書之意，張元濟本人或亦知悉，故每托詞老病。從日常需用不便、政府接收商務印書館、政府恐需樣版人物等事推測，張元濟不會不知道先前所寄望之中共，至此已然變調，其間，張元濟對於共產黨的若干措施，實有不甚認同之處，唯此類建設性的聲音，多見於私人函札，例如他於1952年指出三反、五反運動，說道：

「三反」、「五反」條目雖繁，而其要點只在一「貪」字。貪之為害，不可勝言。推極言之，足以亡國。此次之嚴刑重罰自可肅清於一時，以治病言，□□先究其根源，進而施以適宜之治療除根，免有復發之日。凡人孰不好安逸而惡勞苦，共產之刻苦耐勞實有可過人之處，然我以為只能行之於少數之同志，而不能行之於多數之常人。即能行之，亦只能持之短暫，而不能持之久遠。我以為運動終結以後，必須有根本治理之方。春秋之世，孔墨並稱，而無並卒能行。說者謂其道大毅，民多苦之，洵非無理。弟竊以為亟宜采夫重祿之義，而去墨子大毅之弊。雖不能說貪污從此絕跡，諒可較勝於目前。<sup>181</sup>

三反、五反是中共於1951至1952年所推行的政治運動，「三反」即「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係對國營機關）；「五反」乃「反行賄」、「反偷漏稅」、「反偷工減料」、「反盜騙國家財產」、「反盜竊國家經濟情報」

<sup>179</sup> 《張元濟全集》，第2卷，頁435。

<sup>180</sup> 見《我的父親張元濟》，頁212。

<sup>181</sup> 《張元濟全集》，第2卷，頁420。

（係對私營企業）<sup>182</sup>。張元濟認為此舉「只能行之於少數之同志，而不能行之於多數之常人」、「只能持之短暫，而不能持之久遠」、「須有根本治理之方」，他藉莊子對墨子之評為例，表示當局違背人性的苛刻要求難以長久，不應使百姓陷於墨子那般「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艱」（《莊子·天下》）的境地。綜上所言，張元濟行將就木之際，即便已有隱憂，在當時的時空背景下，恐亦無力回天。

另外，根據王雲五轉述《自由中國》所載由上海帶往香港的一份通訊內容<sup>183</sup>，謂：

據民國三十九年十二月自由中國半月刊（筆者按：王雲五誤記，應係 1950 年 8 月 16 日出刊之第 3 卷第 4 期的《自由中國》）登載同年有人帶到香港附郵的一項上海通訊，大意說：「菊生由於陳叔通的牽線、拉攏和慫恿，好幾年前已與共產黨發生了關係。上海淪陷後，他已登堂入室，成為饒漱石、陳毅的上賓，迨新政協在北召開，他以會員資格北上參加，毛匪澤東以其高年，且負時望，頗予敷衍。他又在會議席上聽到毛匪等口口聲聲說是『為人民服務，向人民學習』一類的話，他天真地誤認可解人民的痛苦。他返滬後，又被任命為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更覺高興。不料迭接海鹽的家鄉來信，謂族眾多遭到清算，甚至他族裡祠堂和祭田也受到強奪之威脅；於是他在祠堂張貼布告，說明面奉『毛主席』示，下級黨政人員不得擾民，一面又向本族招告，謂當彙齊代向有司申訴。稍後他便向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陳說，饒匪當初勸其勿管閒事，因為他這些親友都是土豪劣紳之流，是應該清算的。他聽到這些話，很是冒火，正想直接寫信給在北平的毛匪澤東。有一天商務印書館職工委員會開會，特地邀請他訓話。他如期前往。正開始發言不久，突然會場中發生一片喧囂之聲，一排一排的職工，分別起立對他大罵和臭罵，所有滿清餘孽，文化販子，剝削階級，昏庸老朽，老而不死種種惡名無不加之於他；他如何捱得起此種侮辱，於是忿恨之餘，昏倒在講壇上不省人事，經送醫院救治，留醫數月，返家後，閉戶幽居不再聞問外事，且從此以後，足跡也不再

<sup>182</sup>陶晉生指出：「1951 年，共產黨在黨內清洗貪污，就是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又對工商界有反行賄、反偷漏稅、反盜騙國家財產、反偷工減料、反盜竊經濟情報的運動，叫做『五反』。大批反革命分子被一次又一次政治鬥爭，或下獄，甚至判死刑。」見其編著《中國近代史》（臺北：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頁 216。

<sup>183</sup>筆者按：即陳敬仁〈張菊生（元濟）靠攏的前前後後〉一文，該文末署：「中華民國三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草於上海蝸居，托一友人帶到香港付郵。」，見《自由中國》第 3 卷第 4 期（1950 年 8 月），頁 138。

出門一步」。這一段報導，經後來從上海逃亡至香港的人們傳述，大概都是事實。<sup>184</sup>

王雲五所據文本，查按應係陳敬仁所撰〈張菊生（元濟）靠攏的前前後後〉一文，陳敬仁強調所述張元濟一事：「是親耳聽得商務幾個職員講的」、「敘述完全根據有聞才錄，並無一字虛言，亦未渲染誇張」，而王雲五則轉述了陳敬仁的看法。為更瞭解這段張元濟受辱經過，下面不厭其煩地摘出陳文以與王文對照，陳敬仁指稱：

有一天商務印書館職工委員會開會，特地邀請張副主席（筆者按：張元濟時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前去訓話。張老頭覺得商務是他一手創辦，現在仍由他負責，員工們很多是他提拔出來，他去講話當然不會有甚麼問題的。但他們友人很多對他警告，勸他特別當心，最好先問饒漱石（筆者按：饒氏為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得其同意後再去講話，以免發生意外。張老頭就照著友人的勸告，先去請示饒主席，饒立保證決無問題，張乃心安意得的前去訓話。張入會場之後，見前排所坐者，都是他所認識的員工，過去都受過他的恩惠，他見此情景，更放下了一切疑慮。不料登台開講不上十分鐘，後面竟叫罵咒罵之聲大作，由後面立刻傳染到前面，前數排他可認識的員工，亦接著指手瞪眼的破口大罵，先罵他是土豪、劣紳、大地主、資本家，以後越罵越不成話，甚麼滿清餘孽，文化販子，剝削階級，昏庸老朽，革命對象，老而不死，凡能形容罵人的字句，像連珠砲似的一齊迸發出來，極盡漫罵侮辱之能事。張老頭起初尤欲爭辯，很想教訓幾句，無奈下面群情汹汹，勢如潮湧，而八十多歲高齡的老人，如何能應付這一羣被共產訓練有素的暴徒呢！張老頭立即不省人事，昏倒在講台上面，旋用救護車送到虹口醫院。聞說現在尚未能出院，身體已無全愈之望，最少腦筋今後不能發生作用了。

王雲五認同陳敬仁的報導，陳氏認為張元濟靠攏共產黨是「一件過於天真的故事」<sup>185</sup>，結果換來的是共黨分子的無情打壓。王雲五則又從張元濟的信件以及彼此晤面交往的實情，分析了張元濟政治立場的轉折——先因抗戰勝利而同情國民政府、後因國民政府失去民心而左傾共產黨。王雲五指出：

<sup>184</sup>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899-900。

抗戰勝利之初，他（筆者按：張元濟）第一次託葛敬恩先生帶給我一封長函，透露其因重見天日之歡喜若狂，與對我軍政領袖，尤其是蔣委員長之頌揚愛戴。及是年雙十節，我政府頒授勝利勳章，他也與其列，來函不僅表示受寵若驚，且極度引以為榮。但是稍後由於各地方接收人員不乏營私擾民之事實，他漸寫信給我，表示憤慨，間亦有所建議。及我回京從政，偶來上海，要和我晤談的人無不以他為首。我們晤面，他所要詢問或建議的，無一不是關於國計民生，卻不是關係商務印書館之事，每次經我澄清以後，他大都恍然覺悟，並表示欣慰。因此，直至三十七年五月我就任財政部長以前，他對於政府的態度都很好的表示，即有批評，也是建設性的批評。祇是當我就職財部很少來上海以後，他為國事所感到的煩悶，沒有我為解釋，於是陳叔通乘虛而入，肆意蠱惑，他對政府的態度才開始轉變。總之，菊老的初衷本是純潔的。祇是政治意識過天真，即如上海淪陷後，他竟惑於毛匪澤東饒匪漱石等之言，招致來重大的侮辱和打擊。我深信經過這一天的侮辱和打擊，他定然覺醒了。他的內心痛苦，可想而知，但是他有什你辦法呢？那時候他已八十多歲，其受辱昏倒後，是否因此偏廢，我們固不得而知，然從此以後，不復聞其再度出席匪政協會，或其他公共集會，足見他不是偏廢不能行動，便是託病而不肯再上當了。<sup>186</sup>

王雲五從政之後，兩人漸疏於聯絡，王雲五自認張元濟就此也少了可諮時政的對象；再者，張元濟又與共黨要人陳叔通親近，以致更對蔣氏政權多所質疑，而張元濟自從在該館的職工大會上被屈辱而昏倒中風後，王雲五更揣測晚年的張元濟恐已痛心至極而不欲與聞國事了。又，前引王雲五之言，王說張元濟「受辱昏倒後，是否因此偏廢，我們固不得而知」、1963 年「自香港傳來噩耗，張菊生先生在不久以前作古，時日不詳」<sup>187</sup>，這些話正反映了五、六〇年代國共的嚴峻對峙、彼此訊息隔膜，王雲五無法及時得悉張元濟的生病甚至逝世的消息。

張元濟對共產政權的期望落空了，在張元濟過世後七年，一場由毛澤東發動的文革，在 1966 到 1976 年間，將整個大陸帶向迫害、暴力、批鬥的深淵，文教活動在這十年之間幾乎停擺，以出版事業為例，文化大革命前夕，大陸每年可以

<sup>185</sup> 以上所引，均見陳敬仁：〈張菊生（元濟）靠攏的前前後後〉，《自由中國》第 3 卷第 4 期（1950 年 8 月），頁 136、137。

<sup>186</sup>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900-901。按：有關國民政府各地方接收人員不乏營私擾民之事實，張元濟孫女張瓏亦有見證，見張瓏《水流雲在：張元濟孫女的自述》，頁 42-43。

<sup>187</sup>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頁 893、901。

出版兩萬種圖書，但在大革命發生一年後，卻降到兩、三千種，且市面流傳的多為毛澤東的著作<sup>188</sup>；期刊也由原本將近八百種降到百餘種，到 1969 年竟然只剩下二十種<sup>189</sup>；許多出版機構被裁、被歸併，商務印書館甚至遭到造反派揚言要「徹底砸爛」<sup>190</sup>；編輯人員也遭批鬥的命運。當然，文化大革命在其他方面所造成的浩劫，更有甚於此者。

張元濟未看清共產黨的真正本質就過世了，他生前致力文教事業，而所殷望的毛澤東與共產黨卻在他死後無情地加以摧毀破壞，舉凡出版、新聞、學術、教育、文藝，無一倖免，甚至張元濟身後的遺骸及張家亦不得安寧，孫女張瓏回憶說：「祖父的骨灰葬在上海聯義山莊公墓，墓碑是陳叔通的手書。『文革』時墓被搗毀，幸好弟弟和慶弟去得及時，見碑已毀但骨灰盒尚存，急忙將它接回家。『文革』中，骨灰盒一直在家中存放著，直到 1975 年才得以在家鄉海鹽入土為安」、「經過『文革』抄家，家裡的模樣也大變了。原有客廳和臥室裡的整套紅木家具已經殘缺不全，大部分已被歸入『四舊』的行列而被『破除』，僅剩下零落的幾件尚在使用。母親的描金漆皮箱連同箱內衣物也被作為『四舊』搬走。花瓶、圖章、字畫和祖父從歐洲買回來的許多紀念品也都已不見了蹤影，大理石的雕像全已砸成碎渣，連祖父寫的對聯等墨寶也都隻字無存。」、「『文革』期間我們基本上是沒有可以來往的朋友了，幾乎所有的親朋好友下鄉的下鄉、進牛棚的進牛棚，都斷了來往。」<sup>191</sup>

晚年的張元濟面對逐漸變調的共產黨，困於病體以及相關日記的逸失，很遺憾地我們未能窺見他的相關想法；而身後，共產黨破壞了其一生心繫的文教事業、甚至禍延張家，這應是張元濟始料未及的。

<sup>188</sup> 文化大革命進行的頭四年，商務印書館除了以「東方紅出版社」名義出版俄文本、英漢本《毛主席語錄》外，幾乎沒有出版任何書籍，出版工作一片空白。按：文革伊始，共產黨中央即召令全國出版機構大量印製有關毛澤東的著作（毛作、毛像、毛語錄），商務印書館也被迫配合出版毛語錄。據官方統計，1966 到 1970 年大陸合計出版了逾十億冊的《毛主席語錄》，見毛主席著作出版辦公室、國務院出版口《1966-1970 年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出版統計》，轉引自方厚樞《中國出版史話》（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頁 264。另據當時身在北京大學的張瓏回憶說：「在『文革』開始的最初日子裡，我們天天聚集在民主樓學習《毛選》，稱為『天天讀』。」、「那時，學校已經停課鬧革命，每天的『功課』就是學習毛主席著作、人民日報社論，寫大字報，開大大小小的批判會、鬥爭會。」《水流雲在：張元濟孫女的自述》，頁 138。

<sup>189</sup> 《中國出版史話》，頁 262-264。

<sup>190</sup> 見商務印書館主編《商務印書館百年大事記》，「1966 年」。按：文化大革命期間，商務印書館一度收歸國有，1971 年起則與中華書局合營直至 1979 年分立，商務印書館才又恢復獨立建制。

<sup>191</sup> 《水流雲在：張元濟孫女的自述》，頁 46、48、131。

## 肆、結論

張元濟是新舊過渡時期的知識分子，自戊戌革職以來，他專力的是文教事業，商務印書館是他將教育救國理念付諸實行的主要憑藉，他選擇了一條獨特的路子，全心投身啓迪民智的文教出版，以進行中國現代的啓蒙。他歷經幾個重要歷史時期，卻始終保持無黨派的立場、堅持自由之身、展露愛國熱忱。儘管張元濟與共產黨要人有所接觸，但透過本文考辨，確知其並非共產黨員，證諸張元濟寫給時任上海市長陳毅書信，內有：「今日欣逢貴黨成立三十週年紀念之期，又聞參加朝戰各國開議停戰。慶事駢蕃，專此道賀」云云<sup>192</sup>，張元濟所稱「貴黨」當指成立於 1921 年的中國共產黨，而「貴」字即道出了他非籍隸共黨。張函寫於 1951 年，距離他參與 1898 年的戊戌變法已有半個世紀，戊戌時期的張元濟受光緒帝召見，也與康有為、梁啟超、六君子等人交往密切，為推展維新運動，他上了兩次奏摺，根據所呈奏內容，其中溫和與急進之見皆有，與康、梁相比，張元濟仍相對溫和。在君主立憲的階段，張元濟聯合同道促成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發行報刊圖書以支持立憲運動。辛亥革命風潮中，張元濟對出版孫中山專書一事雖有猶豫，然在支持革命黨人的活動上，又有資助之舉；革命成功後，滿族被迫交出統治權力，孫中山原先排滿的主調也已改為五族共和，張元濟剪辮與掛旗無疑是向前清告別之意，並把努力的焦點轉向建設國家。革命成功至北伐前夕，袁世凱使政局沸騰，張元濟批評他破壞國家安定、出賣國格。抗日之際，張元濟鑑於時局紛擾，再度本其愛國之念，出版激勵民氣的圖書。值國、共之爭時，張元濟與兩黨上層——蔣介石、毛澤東均有直接的接觸。

如何看待張元濟在近代歷史中的角色？自其被革職，遠離官場而致力文教後，張元濟儘量避免涉入現實政治，但不減對國內政局的關心，他自陳：「元濟遷謫餘生，本不當再談國事，惟既生此土，終覺未能忘情。」<sup>193</sup>自維新失敗至辛亥革命成功，張元濟的政治基調由溫和漸進的改良派轉為革命派，革命成功後，其立場又轉為溫和，至其晚年，目睹政局動盪造成的民不聊生、貪污舞弊現象，張元濟甚感痛心，屢屢呼籲維持和平，這是其愛國、人道、民族主義的一面。胡適曾讚譽張元濟道：「如果人人都能像張菊生先生那樣愛打不平，愛說正話，國家的政事就有望了。」<sup>194</sup>張元濟認為〈禮運篇〉所述大同與社會主義最為接近，故對解放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寄予高度期望，他說：「社會主義萬般新，願留老眼覷新國。」<sup>195</sup>久不涉足政事的張元濟，最後十年復進入政壇，擔任第一屆全國

<sup>192</sup> 《張元濟全集》，第 2 卷，頁 389。

<sup>193</sup> 〈致盛宣懷〉，《張元濟書札》增訂本，下冊，頁 1009。

<sup>194</sup> 《張菊生先生年譜》，頁 364。

<sup>195</sup> 〈癸巳歲暮再告存〉七律，《張元濟詩文》，頁 71。

政協委員，並向毛澤東建言，同時分任華東軍政與行政委員會委員，又當選第一、二屆全國人大代表。值得注意的是，從張元濟留下來之五〇年代文獻資料研判，於張元濟晚年，中共當局對他還算禮遇，但隨客觀局勢的演變以及他中風老病因素，張元濟辭世的前幾年，似乎與政治運動核心刻意保持距離，即便對國內外時事有所評議，也多披露於私札或詩歌之中（如 1953 年張元濟已八十七歲高齡，即撰寫了一組七絕詩〈和陳叔通出國紀事俚言七絕二十四首〉）。

進一步分析張元濟的政治立場，他採取的是相對溫和的進路，他對政體並不執著，凡為民眾著想的政治勢力，均表歡迎，這種彈性的態度反映在他不斷調整自身的政治立場上：或清室、或君主立憲、或民主共和、或中華人民共和國。張元濟的政治立場雖幾經改變，卻非政治投機者，他並未出自個人私慾而主動迎合主流勢力，反而是諸多勢力團體競邀其參與，雖然張元濟自戊戌時期離開政壇而專營文教事業，他的目光卻從未離開現實的政治環境。他本著愛國愛族熱忱，反對同室操戈，屢發和平之聲。在民族情感方面，縱使張元濟有濃郁的「反帝救亡」情結，但並不因此非理性地一味排外或盲目反對、抵制西方文化。張元濟不僅關心國內各族之處境，對國外強凌弱的狀況亦強烈不滿，此或源自於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

## 參考文獻

- 丁文江，《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臺北：世界書局，1972。
- 中國史學會主編，《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上海：神州國光社，1953，「第 8 種，戊戌變法」，第 2 冊。
- 孔祥吉編著，《救亡圖存的藍圖——康有為變法奏議輯證》，臺北：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1998。
- 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張元濟軼事專輯》，浙江：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浙江省海鹽縣委員會，1990。
- 方厚樞，《中國出版史話》，北京：東方出版社，1996。
- 方學堯譯註，《清末立憲運動文選譯》，四川：巴蜀書社，1997。
- 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兼論其對儒學傳統的衝擊》，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2。
- 王 英，〈一張照片引出的佳話〉，《中華讀書報》，1996 年 11 月 6 日（收入《商務印書館一百年》，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
- 王紹曾，《近代出版家張元濟》，北京：商務印書館，1984。
- 王雲五，《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3。
- 伊 杰，〈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動因及其演變過程〉，《近代史研究》，總第 51 期，1989 年。
- 余英時，〈戊戌政變今讀〉，《二十一世紀》，第 45 期，1998 年 2 月。
- 吳 方，《仁智的山水——張元濟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4。（另有繁體版，由臺北業強出版社於 1995 年出版）。
- 吳栢青，《張元濟及其輯印四部叢刊之研究》，臺北：私立東吳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
- 李西寧，《人淡如菊——張元濟》，香港：中華書局，1999。
- 汪家熔，《大變動時代的建設者——張元濟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汪康年，《汪康年師友書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汪榮祖，《康有為》，臺北：東大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8。
- 周 武，《張元濟——書卷人生》，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
- 承 載、王恩重，〈張元濟和清末立憲運動〉，《浙江大學學報》，第 12 卷第 4 期，1996 年 12 月。
- 林安梧，《中國近現代思想觀念史論》，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5。
- 金耀基，《中國現代化與知識分子》，臺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8。
-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主編，《清末籌備立憲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79。
- 柳和城，《張元濟傳》，南京：南京大學，1996。



- 茅海建，〈戊戌變法期間光緒帝召見張元濟〉，《社會科學研究》，第5期，2008。
- 倪士毅，《浙江古代史》，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
- 孫中山著，黃季陸主編，《總理全集》，成都：近芬書屋，1944。
- 孫慧敏，〈翰林從商——張元濟的資源與實踐，1892-1926〉，《思與言》，第43卷第3期，2005年9月。
- 耿雲志，《胡適研究論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 高大威，《嚴復的再發現》，臺北：五南圖書出版有限公司，1998。
- 勒德洪等奉敕撰，《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臺北：華文書局，1970。
- 商務印書館主編，《商務印書館百年大事記》，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 商務印書館主編，《商務印書館圖書目錄 1897-1949》，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 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臺北：廣文書局，1971。
- 張人鳳主編，《張菊生先生年譜》，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 張人鳳，《智民之師——張元濟》，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
- 張人鳳，〈戊戌到辛亥期間的張元濟〉，《史林》，第2期，2001。
- 張元濟著、顧廷龍主編，《涉園序跋集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79。
- 張元濟，《張元濟詩文》，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
- 張元濟編，《戊戌六君子遺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89。
- 張元濟著、張愛平整理，〈張元濟晚年軼札七通〉，《檔案與史學》，第5期，1996年10月。
- 張元濟，《張元濟書札》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 張元濟，《張元濟日記》，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 張元濟，《張元濟全集》，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
- 張榮華，《張元濟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
- 張樹年主編，《張元濟年譜》，北京：商務印書館，1991。
- 張樹年、張人鳳主編，《張元濟蔡元培來往書信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2。
- 張樹年，《我的父親張元濟》，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97。
- 張靜廬輯註，《中國近現代出版史料》，上海：世紀出版集團、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
- 張 瓏，《水流雲在，張元濟孫女的自述》，上海：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遠東出版社，2007。
- 梁啓超，《飲冰室文集》，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3。
-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臺北：曉園出版社，1994。
-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 陳建民，《智民之夢——張元濟傳》，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

陳敬仁，〈張菊生，元濟〉靠攏的前前後後〉，《自由中國》，第 3 卷第 4 期，1950 年 8 月。

陶晉生編著，《中國近代史》，臺北：新陸書局股份有限公司，2005。

湯志鈞，《康有為傳》，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8。

費孝通，《費孝通人物隨筆》，北京：群言出版社，2000。

葉宋曼瑛著，張人鳳、鄒振環譯，《從翰林到出版家——張元濟的生平與事業》，香港：商務印書館，1992。

鄒振環，〈張元濟研究概述〉，《浙江學刊》，總第 42 期，1987 年 1 月。

鄒振環，〈《孫文學說》在滬初版發行的前前後後〉，《史林》，總第 15 期，1989 年。

劉兆祐，《認識古籍版刻與藏書家》，臺北：臺灣書店，1997。

劉再復、李澤厚合著，《告別革命——二十世紀中國對談錄》，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9。

劉怡伶，《張元濟思想研究》，南投：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9。

劉怡伶，〈有關張元濟的若干問題考辨〉，《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第 67 期，2001 年 12 月。

蔣介石著、秦孝儀主編，《先總統蔣公思想言論總集》，臺北：中央委員會黨史會，1984。

蔡崇安，《張元濟經營商務印書館之研究》，臺北：私立淡江大學漢語文化暨文獻資源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蕭公權，《康有為思想研究》，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8。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5。

錢濟鄂，《吳越國武肅王紀事》，臺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1999。

嚴復著、王栻主編，《嚴復集》，北京：中華書局，1986。

蘇精，《近代藏書三十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83。

Pye, Lucian W. 著、艾思明譯，《中國人的政治心理》，臺北：洞察出版社，1988。

Feng Chia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pp.175-226, No.19, Dec. 2009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Feng Chia University

## Social Change and Balance: An Analysis of Zhang Yuan Ji's Political Stands

*Yi-Ling Liu\**

### **Abstract**

This case study aims to explore Zhang Yuan-Ji's political stands at the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s like the Reformative Movement, the Constitutional Movement,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nd the conflicts between the Kuomintang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and to analyze whether these stands are contradictory to each other so as to clarify his historical position. This article starts with historical literature, discussing Zhang Yuan-Ji's points of view and contrasting those views with his actual actions in order to analyze Zhang Yuan-Ji's thinking and basic attitudes toward politics during several important periods.

This article discovers that after Zhang Yuan-Ji was deposed, he stayed away from official circles and devoted himself to culture and education, trying his best to avoid being involved in Realpolitik. However, this did not decrease his concerns about the domestic political situation. Starting from the failure of reformation to 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Zhang Yuan-Ji's key political stand shifted from a gentle and gradual reformist to a revolutionist. After the success of the revolution, his stand shifted back to be gentle again. At his old age, seeing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people could not live in peace, but instead in corruption, fraudulence and misery due to political turmoil, Zhang Yuan-Ji felt distressed and repeatedly appealed for maintaining peace. Although Zhang Yuan-Ji's political stands changed from time to

---

\* Assistant Professor, St. Mary's Medicine Nursing and Management College.

time, the core of his concerns is the people's well-being all the time. People, the common focus of the traditional "people first" concept and modern "democracy" are his constant priority consideration. This also reflects his belief in patriotism, humanitarianism and nationalism.

**Keywords:** Zhang Yuan-Ji, reformation, revolu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the Kuomintang.